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界五千年—影响人类历史200件大事(2)下



世界五千年  
影响人类历史 200 件大事

## 古印度阿育王皈依佛门

公元前5世纪，在古印度的迦毗罗卫王国，年轻的王子乔答摩·悉达多舍弃了早已给他准备好的王位和豪华舒适的生活，带着对“无常”的苦恼，独自悄悄离开家门，远走他乡，以苦苦求索人生的真味。六年后他终于觉悟而得道成佛。他就是佛祖释迦牟尼。

300年后，仍然是在恒河流域这片广袤丰饶的土地上，有一个强大的孔雀王朝，一个王子占取了那本来并不属于他的王位，并在一鼓邪气的支配下，征服了邻国。然而胜利并不曾给他带来狂喜，遍地的尸血却令他幡然悔悟。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时，佛的光辉照在了他的身上，300年前那位王子的顿悟给了他一个光明的世界。因此他决心以善行来解救自己罪恶的灵魂，将佛的恩泽广播于世。正是他这旷古未有的转变，才使佛教得以迅速传入亚洲各国以及世界各地，对各国的政治与社会生活产生了并继续产生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而这位充满了传奇与神话色彩的古印度之王，便是孔雀王朝赫赫有名的阿育王。

那么，佛教又是在什么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呢？在此我们必须追溯一下古印度的历史及佛教得以产生并流行的情况。

在南亚次大陆的中部，肥沃丰饶的恒河流域，有一个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文明古国——印度。公元前两千多年，古印度土著居民达罗毗荼人所创造的光辉璀璨的哈拉帕文化照亮了整个东方，因此也引来了尚处于原始野蛮状态的雅利安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后来者毫不留情地给这个古老的文化打上了句号。接着，他们输入了自己的接近于原始宗教崇拜的文化，他们按自己的思维模式，建起了严格的种姓制度，这个种姓制度就是后来统治了印度半个多世纪的婆罗门教赖以生存的基础和因而灭亡的原因。

得势的婆罗门得意地宣称，神用口创造了他们，然后才用手创造了刹帝利（武士），用腿创造了吠舍（手工业者、农民），最后用脚创造了首陀罗，并以此决定了四者的高低尊卑和职业。作为神的“最洁净的部分”所创造的婆罗门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利，因而他们当仁不让地成为社会的最上层。

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口”是“最洁净的部分”，同时也是最软弱无力的部分的事实。拥有军事和行政权的刹帝利在南征北战中打下江山并辛苦地继续维持，可是他们所创造的安宁环境却成了婆罗门凌驾他们的乐园，他们当然愤愤不平；而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的农业和手工业，使吠舍们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的矛盾日益突出，广大的贱民和奴隶更是对婆罗门无所事事却又作威作福的行径恨之入骨。这样历史的发展使各种不满日益明显地溢于整个社会，婆罗门教逐渐日薄西山。因此，到公元前6世纪至5世纪，它便面临着崇尚努力修行的“沙门”思潮的强烈冲击。

恩格斯说过：“历史上的伟大转折有宗教变迁相伴随，只是就迄今存在的三种世界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而言。”早期佛教和当时各种新思潮一样，是在列国时代的“伟大转折”里所创立起来的新宗教。

公元前六世纪至五世纪，古印度中诸国林立，也就是所谓的古印度的战国时代。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便是其中之一。国王“净饭王”有一子乔答摩·悉达多，被寄予厚望。国王希望他能继承王位，将来成为统一天下的“转轮王”。王子从小生活优裕。长大后，父亲怕他受“沙门”思潮影响而给他一切享乐的设施，丰厚的财宝和众多的美女任他享受。然而自小爱思索的悉达多仍然

没能在享乐中麻醉掉自己，反而更加清楚地洞察到世间的“无常”。弱小的国力所产生的朝不保夕感及对生老病死的不可摆脱感使他无比地烦恼困惑，而婆罗门教思想和行事丝毫不能使他感到解脱。最后，他决定舍弃将来的王位和荣华富贵，出家修行，寻找人生的真谛，那时他才 29 岁。出家后，他首先来到跋伽仙人的苦行林，最后他并不满意他们折磨肉体的苦行生活，滞留一宿便离去。此后，他又拜访了几位修行者，仍然没有找到满意的解脱之道。因此，决定自行苦修，在尼连禅河边静坐思维。然而，六年过去了，依然没有获得所期望的结果。他决定放弃苦行，来到菩提伽耶一棵毕钵罗树下，结跏趺坐，静思冥想，最后终于觉悟成佛，世称释迦牟尼。而他所思考出的那种独特的观念便是佛教的源泉。在他觉悟后长达 45 年的时间里，他一直坚持不断地向世人讲说自己的观点，他的足迹遍布了恒河流域中印度的大国小国，对象包括了社会上各个阶层的人，从婆罗门到首陀罗，甚至妓妇和盗贼。他那博大精深的思想、不拘一格的形式很快便征服了印度人的心。这样佛教在印度公然流行起来，特别是它在与婆罗门教等其它宗教的斗争中所取得的胜利，更是扩大了它的影响。它公然抛弃了婆罗门的等级制度，不分种姓高低，僧团内只有按受戒先后的长幼之分，这也使它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人广泛的赞同，因而获得了极大的生命力。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刹帝利和吠舍中的工商业者都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为教徒们提供住宿和衣食，专心听大师说法。所以婆罗门教则日益被人冷落，婆罗门的地位受到了巨大的冲击。

佛教不仅在印度各地流行开来，而且以后又播迁到世界各地。

佛教在古印度广泛传播和成为占优势的宗教，然而很多人并不曾真正理解它的含义，而且在释迦牟尼的时代，传教范围也仅仅局限于中印度的恒河流域一带。那么，佛教又是如何得以发展到今天这种举世闻名的程度的呢？我们知道，有许多部落民族自己所产生的宗教虽然在当时也获得了本民族人民的厚爱，然而最终却被历史的潮流所淹没或仍然停滞于本民族之内，没有在上世界上广泛地传播开去。而佛教为什么能得到如此殊荣？只要我们沿着历史查询，我们很快就发现了这样一个名字——阿育王。

公元前 327 年，马其顿亚历山大在灭亡波斯后侵入次大陆的西北部。这时那里正处于许多小国分立的局面，亚历山大将其各个击破，很快便征服了五河流域（即旁遮普）。亚历山大还想继续东进，但由于士兵厌战和难陀王朝的强大，不得不于公元前 325 年顺印度河南下撤回巴比伦。他撤离后，将征服的地区交还给两个傀儡管辖，另设总督和驻军监管。

亚历山大撤离后，次大陆北部人民起义到处发生，政局十分动荡。当时一个名叫旃陀罗崛多的人成了驱逐马其顿驻军的领导人。他手下有一个得力的辅佐大臣，名叫侨底利耶，相传是著名的《政事论》的作者。旃陀罗崛多（约公元前 324 ~ 300 年）领导下的起义军最后成功地驱逐了侵略者，大约是在公元前 324 年，旃陀罗崛多便独立为王。而后，他又东进攻下了摩揭陀的首都华氏城，推翻了难陀王朝。从此，次大陆北部统一起来。据说，旃陀罗崛多出身于农村一个养孔雀的家族，故称他所建立的王朝为孔雀王朝（约公元前 324 ~ 187 年），其帝国为孔雀帝国。旃陀罗崛多依靠大批常备兵（据说有兵力 60 万人），在次大陆进行扩张和征服活动，他又成功地抵御了塞琉古王国的入侵（公元前 305 年）。他死后，他的儿子宾头沙罗（约公元前 300 年 ~ 273 年）继续扩大领土并镇压了爆发于叉始罗的起义。孔雀王朝至阿育王时（约公元前 273 ~ 236 年），又大举征服南印度的羯陵伽。此时，次大

陆除南端以外，北起喜马拉雅山南麓，南至迈索尔，东抵阿姆西界，西达兴都库什山，都已并入孔雀王朝的版图，形成了一个空前庞大的统一帝国。

孔雀王朝的国家基本上是一个统一的奴隶制的专制帝国。国王是国家的最高主宰，集政治、军事、司法等方面大权于一身，并设有庞大的官僚机构维护统治。据塞琉古王国驻孔雀帝国的使节美伽斯提尼记载，国王之下有一个不大的统治阶层，这些人可以充当国王的顾问和参议，也可以被选拔为各种官员。官员有三类：第一类是地方长官，他们主管修治河渠，丈量土地，监督灌溉用水之公平分配；他们也管猎户，有权酌情予以赏罚；他们还负责收税、监督与土地有关的行业（如伐木、采矿等），还负责修治道路。第二类是城市长官，他们分为六组，每组五人。各组分别主管手工业、外侨、生死登记、市场交易及度量衡、产品检查以及征收什一之税等事项。第三类是军事长官，他们也是分为六组，每组五人。各组分别主管海军、后勤辎重、步兵、骑兵、车兵以及象兵。孔雀王朝第一类官员主管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财政部门 and 公共工程部门，第二类官员主管的也是财政部门，第三类官员主管的则军事部门。

孔雀帝国分为若干个省（阿育王时至少有五省），靠近都城的东部和中部省份由国王直辖，边远省份往往由王子统治。帝国境内还有很多处于半独立的部落。国王对中央、地方和军队的官员都派密探进行侦察和监督。

阿育王对这个庞大帝国的统治维持了 40 多年，这是孔雀帝国的极盛时期。但这个庞大的帝国没有统一的基础，各个地区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保有很大的独立性。阿育王的统治无法消除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很尖锐。因此，这个靠武力征服而统一的帝国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阿育王死后不久，西北地区和东部核心地区已由他的两个儿子分别统治，开始了分割帝国的过程；原来在帝国内保持半独立状态的安度罗，也据有南部地区宣布独立。因此，盛极一时的庞大帝国遂告分裂。大约在公元前 187 年，孔雀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被其将军普沙密多罗·巽伽（约公元前 187 ~ 151 年）所杀，孔雀帝国也就正式覆亡了。

以上我们回顾了古印度史上的孔雀王朝的简单历程，下面再来看一看阿育王的生平事迹及其与佛教的不解之缘。

就好像注定阿育王要成为尊崇佛教、广播佛教之种的圣君一样，他的诞生与登基也充满了他所信奉的佛教那样的玄虚与神秘。

大约在公元前 600 年左右，在印度广阔的恒河平原上，对峙着大大小小的 16 个国家，它们彼此发动战争，企图吞并对方，一统天下。最后经过长达百年的战争，中部的摩揭陀王国成为了胜利者，拥有强大实力的摩揭陀仍然一如既往地放纵它的侵略野心。当孔雀家族中年轻的冒险者笈多夺取了前篡位者难陀的大权之后，他把整个帝国扩展成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孔雀王朝。印度河平原、恒河平原及远达西北的大片土地都成为了以后阿育王得以顺利传播佛教的基础。

古印度从“战国时代”逐渐向一统帝国的过渡，自然使佛教也得以逐步播迁到印度全境。孔雀帝国的兴起，也为阿育王驰骋疆场、建立一个空前庞大的帝国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政治、军事基础。当然在这里，笈多只是一个过渡性人物。

可是，当他的儿子频头婆罗继承了他的王位之后，又在孔雀王朝的版图上加上了德干高原和远达阿拉伯海、孟加拉湾的丰饶土地。阿育王就是这位

英勇无比的国王的儿子。

当时孔雀帝国有一个詹波城，城里的婆罗门养有一个天生丽质、聪慧过人的女儿，不觉已到了应当出嫁的年龄，婆罗门决定请一位有名的相师来占卜他女儿未来的命运。相师应邀前来，见到他的女儿，审视良久，沉吟片刻，然后随即道出了一番影响了整个印度历史的话。他说，这个女儿不仅注定要嫁给一个国王，而且将生得两个儿子，第一儿子将成为四分转轮王（佛教传说之圣王，也就是领有所谓“四大部洲”之一的“南瞻部洲”——印度的王）；另一个将出家修行，得道升天。婆罗门大喜，重谢了相师，随即便盘算起应将女儿送到哪位国王的膝下。事有凑巧，正当这个时候，频头婆罗南征北战、捷报频传，他的英名震动了整个印度。于是，婆罗门对他的女儿作了一番精心修饰后，带着她来到了频头婆罗居住的波吒利多城。由于当时的妇女地位低下，不能上殿面见帝王，婆罗门便留她在外面等候，独自走入宫殿，见到频头婆罗，说明来意。频头婆罗并不在意这样的事，随便吩咐让他把女儿送到后宫听候皇后的安排。婆罗门依言而行。皇宫里的妃子们见到这位女儿，都大吃一惊，没有想到世界上还有这样漂亮的人，都觉得自己丑陋无比，忌妒之心顿生。她们害怕婆罗门的女儿一旦当上王妃自己便会失宠，因此便一致商定让她去作剃须师，专门给国王剃须。婆罗门的女儿没有争辩。一天，国王叫到剃须师，婆罗门的女儿便前往国王宫里剃须。由于她温柔的动作使国王感到十分惬意，不觉睡去，醒来后十分高兴，便要重赏剃须师。婆罗门的女儿却拒绝了一切金银财宝，委婉地说：“妾希望能够与王同榻共枕。”频头婆罗颇感意外，说：“你是剃须师，我是国王，地位悬殊，如何能够同眠呢？”婆罗门女立即向国王陈说了她的经历。频头婆罗顿时醒悟，再看此女，娉婷袅娜、风韵万般，远胜其他王妃，不胜高兴，便纳她为妃。几番恩爱，不久婆罗门女身怀有孕。正值国王母丧除忧之日，她生了一个男孩。频头婆罗便为他取名为阿育（无忧的意思）。这便是阿育王奇妙的诞生经历。

读到这里，你也许想不到孔雀王朝最强盛时代的国王阿育王竟有这么神秘有趣的出身。当然，这也许有点传奇色彩，然而其以后的活动则更为离奇。

然而阿育却不曾得到父王的喜爱。尽管他长大后聪慧过人，父王却认为他品性顽劣粗暴，不足为爱。不觉中频头婆罗已到垂暮之年，他应当为他的继承者考虑了。到底选谁，他还有些拿不定主意。因此他请来帝国中最著名的相师，请他占卜定夺。

占卜在宫中金殿上举行，各王子被召至殿上。当时，阿育由于他的父王平素不喜欢他，便不想前去，认为没有希望。然而他母亲却坚持要他前往。阿育于是前往金殿。途中，阿育碰到大臣成护。成护见他走得匆忙，由此知道他是去占卜未来的，便叫住他，给了他一头老象让他坐着前去。阿育到了殿上以后，径直走到诸位王子中。坐在地上，等候占卜。各位王子都是衣着华丽，骑着高头大象趾高气扬地来等候占卜，然后他们坐在金丝银缕点缀的座凳上，看着阿育穿着粗布衣服，骑着不知从哪儿弄来的老象，来到殿上一屁股坐在地上，便有些窃笑，他们不禁都摇了摇头。他们不知道这位平素惹父王讨厌的弟弟此时到底来凑什么热闹。频头婆罗也看见了，阿育的行为使他大为反感，不过到底也是自己亲生的儿子，便没有发作。这时，阿育的母亲又给他送来了用陶瓷盛装的普通的奶酪。跟其他王子面前的金银器皿盛装的山珍海味相比，因而显得十分寒酸。准备停当，频头婆罗便让相师开始占卜。相师早已在心中卜出谁能够当上太子，那就是阿育。然而他也看出，频

头婆罗并不喜欢阿育，所以，他不敢明白而直接把阿育的名字说出来。于是他说：“今天诸王子中，坐着最特别的坐骑的王子将来会为王。”频头婆罗心中明白，但他不愿就此罢休，便让相师重新占卜。然后相师接着又说：“诸王子中坐着最好的地方、穿着最殊胜的衣物、吃着最殊胜的饭菜的将来会当王。”众王子听说得此话，个个非常高兴，立即互相攀比起谁的衣料最好、饭菜最香、凳子最华贵，都认为王位非自己莫属。频头婆罗和大臣们却听出了玄外之音。他们一琢磨就知道了，最好的坐具是土地，最殊胜的衣服是粗布，最殊胜的食物是奶酪。频头婆罗心中不满，然而却不便发作，便叫退下。阿育回到家中，仔细向母亲诉说了今天的一切，他的母亲立即明白了，她的儿子将会成为孔雀王朝之王。阿育非常高兴。

这个故事也说明当时在继承王位问题上，阿育王将面临艰难的挑战，鹿死谁手，前途未卜。因此，斗争将继续下去，一直到一方最终胜利为止。当然面对的最大阻力，还是其父的偏见与短视。

然而频头婆罗却想同命运抗争。自然，他不会亲自命令杀死阿育。当时正巧有一个叫做德叉尸罗的属国发生叛乱。蛮横的人们扣留了国王派去的执政官，公然表示反抗。频头婆罗想出了一个主意。一天，阿育被父王召到宫中，频头婆罗对他讲述了德叉尸罗的叛乱以后，就命令他立刻率兵前去征讨，然后给了他一些军队，可是却不给军队所需的物资器材。频头婆罗深知德叉尸罗的野蛮，加之他所挑的士兵又是老弱病残的劣等兵，还没有什么物资作后盾，阿育此番前去，必死无疑了。阿育一声不吭地接过命令，率领他的军队就向德叉尸罗开去。

德叉尸罗人很快便听到阿育率兵前来的消息，然而奇怪的是，他们不但不组织自己的军队前去抵抗，反而远远地在长达 15 里的路上洒上香水，清洗道路，夹道欢迎阿育的到来。阿育到此，非常诧异。一个长者对他说：“我们来迎接大王并不是想和您打仗，也不是想背叛您。只是由于您的父亲派的大臣在我们这儿胡作非为，因此我们实在是忍受不了他的残暴才把他扣起来的。望王明鉴。”阿育听得此事，知道是那大臣咎由自取，便接受了人们的欢迎，高高兴兴地进入城中。入城后，阿育王广纳民意、博采众议、制定新的规定，一时间德叉尸罗人民安定，秩序平稳，一派繁荣。阿育的名声大振。

挑战与机遇并存，阿育王受命出征，并没想到事情会如此顺利，不费一兵一卒便平息了事态，这自然使其在国内的地位大为提高，也为其以后顺利执掌国柄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阿育凯旋而归，这使频头婆罗感到意外。可是叛乱已平定，他也非常高兴。不久频头婆罗身染重疾，此时他的长子修私摩被派往德叉尸罗，频头婆罗命令阿育速去叫回修私摩，要把国事托付给他。然而大臣们却不愿这样做，因此他们给阿育涂上黄姜汁，说他有病不能前去。频头婆罗心中忧愤，病情加重，奄奄一息，大臣们却又拥着阿育前去谒见国王，说：“这是王子，愿大王授与王位。”频头婆罗怒而不言，然而众人便把王冠戴在阿育的头上，国王长叹一声，喷了一口热血，溘然而逝。阿育因此得以登上孔雀王朝的王位。

阿育虽然在大臣们的拥戴下继承了王位，然而他的王位并未稳定，因为他的几位兄弟们向来就鄙视他，而且暗中与他争夺王位继承权。以前尽管没有同室操戈、兵戎相见，这次阿育抢先下手，夺取了王位，这自然会引起其他人的愤怒。

因此登上王位的阿育王并不是面对着一个安宁的帝国。首先他的几位哥哥便对他的登基表示反抗。他们逃出都城，会同从德叉尸罗返回的大哥修私摩，纠集了队伍，公开对阿育王宣战。这次战争一直继续了四年，阿育最终杀死了他的哥哥们，赢得了胜利。

胜利后的阿育王自然有足够的理由过起昏天黑地的奢华生活。像他的祖父和父亲一样，他在宫殿里大摆宴席，同贵族大臣们开怀畅饮、一醉方休；他在自己豪华的园林中与妻妾们恣意作乐，通宵达旦；他常常威风凛凛地率领他庞大的卫队跨出都城，仅仅是为了消遣打猎；他贪财如命，同时又一掷千金。年少得志的阿育王沉醉在纸醉金迷的帝王生活中，溺于爱欲，恣意任为。

而阿育王顽劣狂暴的性格此时更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他能够毫无阻拦地让它在他的帝国中横行。在与王兄的长年征战之后，他变得比以往更为凶暴，惩罚人已变成他的一种特殊嗜好。假如有一天他不亲眼见着对人施以刑罚，便有些魂不守舍，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香。因此每天早上他都要先命令对人捆绑、拷打、杀戮，这些公事例行完毕之后，他才心安理得进早餐。并且他不相信任何人，自小受人歧视所养成的自卑的性格，使他即便大权在握后也仍然要通过杀人来掩饰内心的空虚与恐惧。因为他觉得处处都是敌视他的人，所以他要把他们斩尽杀绝。因此一些邪恶的婆罗门看到了国王这个弱点，他们给阿育王的杀戮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那就是：若能杀死 1 万人作为祭祀献给神，不但可以解脱心灵的痛苦，而且还可以使国政昌盛。这正中阿育王的下怀，因此他命令修建一座祭祀堂，又找来一个心狠手恶的刽子手，命令他掌管这个祭祀堂，不论是谁，只要跨入此堂，就要被杀死用以祭神，直到 1 万人满了为止。祭祀堂里装备了许多种令人望而生畏的刑具，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把人杀死送给神，如斩首、剁碎、剥皮、焚烧、烹煮等。这样，从此之后，这座祭祀堂里便传来绵绵不绝的惨叫声，刽子手的记录本上的数字在飞快地增加着，阿育王也在这惨叫声中体会到了无穷的快乐。

阿育王在国内任意残害臣民，甚至设立人间地狱。而且对战俘也是血腥屠杀，他征服羯陵伽，结果是那里有 15 万人（畜）被掳走，10 万人在战争中被杀，还有若干倍于此的人死亡。

当然，阿育王在治理国家的热情上丝毫不亚于他对爱欲和杀戮的兴趣。他及时地处理朝里的大事，公正地对待他的臣民，用他祖先的方式一如既往地统治这个地域宽广的帝国。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充分继承并发扬了他父亲和祖父的勃勃野心。他要使孔雀帝国在他的手中成为前所未有的大帝国。他的目标最终实现了，通过了解印度历史，我们现在知道，阿育王所统治的印度，是古印度历届朝代中版图最大的。

然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并吞其他的国家，武力是不可缺少的。因此阿育王开始频繁地派出军队，攻打邻近的弱小国家。那些不堪一击的小国都顺服地跪拜于他的脚下。这样土地的增长使他狂妄的野心更加膨胀起来，他把目标投向了更强大的民族，羯陵伽族便是他的首要目标。

对羯陵伽的征服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恒河平原上的羯陵伽族是一个比较强悍的民族。强烈的民族意识使他们敢于跟外来的任何敌人拼死到底。不仅如此，而且，羯陵伽的实力也非常强大，在恒河平原上已是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有利的地形和内部的团结使这个部落日益蓬勃发展起来。然而，毕竟在这个时候它还没有达到十分强大的



地步，特别是没有与阿育王的军队相抗衡的能力，所以，它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在群臣的怂恿下，这一次阿育王决定亲自率领他的大军出征羯陵伽。这是他即位后第一次率军攻打外族，也是最后一次。前不见头、后不见尾的大军浩浩荡荡地向那个即将面临灭顶之灾的羯陵伽族部落开去。

战争在宽阔肥沃的恒河平原上拉开序幕。羯陵伽人尽管知道自己取胜的可能性很小，然而他们仍然进行了拼死的抵抗。他们呐喊着挥舞着盾牌和大刀向阿育王的军队冲去。平原上血光闪闪，杀声震天。第一次遭到这样强悍而又亡命的对手使阿育王的士兵们措手不及，许多人还没有从这震慑人的气势中清醒过来便被一刀砍死。这样阿育王的队伍稍稍有些慌乱。可是，他们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士兵，不久他们就恢复了镇定，开始冷静地面对近乎于疯狂的羯陵伽人。战争残酷地进行下去，战场上到处都是倒下的战马和士兵，随处可以看见断腿和滚在一边的头颅，浑身沾满鲜血的士兵仍然在猛杀猛冲，战鼓始终擂得震天响。阿育王有条不紊地指挥他的士兵向羯陵伽人杀去。战场的局势渐渐明朗下来，羯陵伽人的军队开始动摇。然而他们仍然不放松最后的希望，要向阿育王的军队拼死一搏。一批批士兵倒下去了，紧接着另一批士兵又冲了上来。阿育王的军队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平原上渐渐形成一道血的河流。阿育王久攻不下，心中烦躁，脸上泛起青光。熟知他的大臣们知道，一场大的屠杀即将到来。

阿育王这时已变成一个穷凶极恶的屠夫了，他满眼凶光，拼命地歇斯底里地指挥士兵向前冲杀。

最后，阿育王下令全面进攻，大军潮水般向几乎已丧失抵抗力的羯陵伽人冲去。郁集的怒火一齐爆发出来，手中的武器很快落到了手无寸铁的羯陵伽人身上，连妇女和儿童都不能幸免。羯陵伽人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不得不屈辱地跪倒在阿育王和他的军队的脚下。然而战争并没有因此而结束。被俘获的15万羯陵伽人也在劫难逃，他们当中的十万身强力壮的士兵被一个个杀掉。而怒气未消的阿育王的士兵仍然恣意地在村庄里乱闯乱杀，整个羯陵伽族陷入巨大的灾难之中，死亡的阴影一直笼罩着这片土地。

有时候事情的变化往往会出现匪夷所思的戏剧性变化，刚才还是阴云密布，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沉寂的气氛，霎时便风息云散、万里晴空了。阿育王此时也在悄悄地发生着类似的变化。

胜利并没有令这位伟大的君王欣喜若狂。他几乎是非常平静地指挥完这场艰苦卓绝的战争，又非常平静地面对战争所带给他的一切。不仅自己军队所遇到的顽强抵抗和遭受的损失令他震惊，而自己的士兵们痛苦的倒下的形象更是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以前的征战他视为乐趣，那是他征服欲望被满足之后的乐趣。可是现在，他再也体会不到那种乐趣。他的胜利是用他的几万名士兵的生命换来的，他好像第一次认识到这一点。

而他在硝烟未褪的战场上所巡视到的另一幅景象则更加深入地触及他的灵魂，他不相信那就是他所征服的民族。眼底下无数的尸体在他的脚下无声无息地躺着，都保留着最后一刻的战斗姿式。他们紧咬牙齿，脸上显现出无比愤怒，不瞑的眼珠上蒙着一层不可知的迷茫，好像在探寻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狼籍的战场上空，秃鹰在飞旋，不时发出凄厉的鸣叫。阿育王深深地震动了。仿佛这时候，他才清楚地知道，一直同他负隅顽抗的他所痛恨的羯陵伽士兵也是同自己一样活生生有血有肉的生灵，然而就由于他这一邪恶

的征服意志，那些无辜的生灵们就得付出自己的生命。走到断壁残垣的村庄旁边，听到的都是失去丈夫的妻子的痛哭，失去父亲的儿子的啼哭，失去儿子的父母的呜咽，那揪人心肠的哭声纷扰着他的心，一直使他一刻也平静不下来。这样整整几天，阿育王都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痛悔之情溢于言表。

阿育王眼见的是一幅幅惨不忍睹的悲剧场景，在这时，阿育王的心里也在进行着一场痛苦的炼狱。

军队安静了下来，屠杀停止了，此后平原上得到了阴惨的平静。然而阿育王的痛楚后悔之情却日益明显，他深刻地反思了他的所作所为，他把自己放到曾经在他手上遭难的人的位置设身处地地反思，从而他陷入了更大的痛悔之中。一方面他深深地为自己曾经犯下的罪恶而感到不安；另一方面他同时也感到决不会再将这些罪恶持续下去了。

他公布了举世著名的碑文，在这篇碑文中，阿育王将他的痛悔之心明明白白地公布于天下。从来没有哪位胜利征服者会对他所征服的地方表示怜悯。可是阿育王不，他坦诚地在碑文中写道：

“皇上征服并吞羯陵伽族后，内心非常懊悔。……因为必须以杀戮民众或捕捉俘虏为手段，才能征服如此顽强不屈的民族，真是一件令人痛心和遗憾的事。”

接着他又继续写道：“即使被虐杀、残害或俘虏的人民，仅有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皇上也会感到歉疚难安。如果将来有人背弃了皇上，皇上也会宽恕他。皇上对居住于原始地带的野蛮人也会同样仁慈公正的态度来进行统治，即使稍有疏忽，皇上也会悔恨不已。人民应在皇上的感召下，不再胡作非为。皇上衷心希望所有的人都能明白安全与自制的重要，如此才能享有和平宁静的幸福生活。”

写完这个告示以后，阿育王决心让仁爱平和来充满他的整个帝国。这样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他回到了都城。

阿育王决定皈依佛教，并用佛教的精神面对他的国民和世界。

其实阿育王对佛教并不陌生，也并非头一次心血来潮要皈依佛门。佛教在帝国境内的广泛传播当然会引起阿育王的注意，自然也会或多或少地影响他的思想。前面曾经提到阿育王要杀死一万人祭神的事。这件事最后的终止也正是因为一位沙弥的现身说法。传说中这位沙弥无意闯入祭祀堂，如果按照阿育王的命令，他当然会被处死。这位沙弥请求给他七天的忏悔期。在这七天之内，沙弥因目睹祭祀堂的罪行，眼见的都是血肉、骨骼等，便对无常圣谛获得正解，成就神变。死期之日，“沙弥既证圣果，心夷生死，虽入镬汤，犹在清池”。滚烫的油锅竟然耐他不得。阿育王得知此事，赶到祭堂，沙弥当场为国王说法，对他讲述着杀生的罪愆以及佛祖的恩德。从而使阿育王深感惭愧，便杀死了狱主，折毁了祭祀堂，从此不再在国内妄杀平民。关于这个传说，当然有虚夸的成分，可是沙弥说法使国王悔悟之事应当是真实的。此后，阿育王请来一位著名的高僧专门为他讲法，这样使阿育王的信仰极大的增长。也使得目睹羯陵伽人的悲惨景象后他从内心深处的彻底转变成自然。

就在征服羯陵伽族的同年，阿育王最后正式皈依了佛门，成为一名佛家弟子。佛教也从此成为印度帝国的国教。在今天印度国旗绿白黄三色中间一个醒目的蓝色法轮，这就是为了纪念阿育王及他的这一伟大转变所带给印度的深远影响。

皈依佛门以后，阿育王也就好像整个人都变了个样似的，真个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阿育王也就从此不再出去狩猎，不仅中止了豪华排场的宫庭宴席，而且将每日宫庭里肉类消费量降低到两只孔雀、一只鹿的极少限度。而他自己则从此消减了欲念，也不再吃肉，以一个佛门弟子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他颁布了法令，禁止在某一时期内杀飞禽、走兽和鱼类。

他经常出去体察民情，以虔诚的心情到寺庙里参拜。他也经常在寺庙前建立纪念碑，刻上自己的诏示。与此同时，在全国各地的山岩、石柱和洞壁上，这种大量的石刻诏书也随处可见。他通过这个向国民阐释佛家思想，以佛家的道德准绳来约束自己的臣民。他在一个“磨崖勒文”中这样写道：“人人应该遵守的规律——佛教所谓的法，其精髓即是行善事、怜悯、亲切、诚实和简朴的生活。应听从父母，对亲朋、僧侣、苦行僧等，应宽宏大量，重要的是不得杀生。”他不仅仅是把这些命令在全国立起来，而且还定期派出“正法”大臣前往全国各地巡视，检查他的“正法”统治的进行程度。与此同时，他致力于许多社会公益事业；开辟道路，栽种果树，建起许多救济院，收容动物和无依无靠的人民。他的宽容之心还表现他对宗教的信仰上，尽管他皈依了佛门，然而他仍然不排斥其他宗教。

当然，更可以想象出此时他对佛教的信徒的种种优惠，以及他自己对佛教所做的贡献了。他在佛祖释迦牟尼第一次说法的地方——鹿野苑，建起了一根巨大的石柱。在这根壮丽的石柱上，有一只脚踏法轮的狮子，整个石柱上都布满了优美的图象，它是印度最宏伟的纪念碑。他还在帝国的境内建起了多达 8.4 万座的佛舍利塔，塔内每天都点着油灯、燃着薰香，饰以各种宝物。同时，阿育王又对佛门施舍大量的土地财物，大力供养佛教僧团。全国各地的僧人都受到了很好的待遇。

在这样宽松优裕的条件下，佛教内部的自由思想也逐渐滋生起来，佛教分裂的情况很严重，各派的教徒们甚至对一些基本的教义也争吵不休。因此阿育王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当他在都城鸡园寺大供佛教僧团的时候，几乎全国各地的僧人都来到这里。趁此机会，阿育王决定对佛学教义进行勘正。他请著名高僧目犍子帝须长老召集 1000 名有资历的僧侣，念诵经典，并制定和编纂了《论事》，洗清了佛教内部的纷争，并命许多长老到全国各地及国外传教，使佛教进一步在全国各地流传开来。

同时，阿育王对佛教在国内指引国民生活还不感到满足，他还尽力推广佛教，将其远远地推广到印度东北部的极偏远地区以及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弘扬佛法的僧侣们，秉承国王的旨意，将佛祖光辉达到了亚洲东部的国家，西部的希腊文明地区，甚至远达埃及。

当时希腊人正在自相残杀以追求帝国光荣的幻影，他们害怕这个东方强大的帝国会乘虚而入使他们沦为奴隶，所以顺利地接受了使者们阐扬的大法以换取和平。阿育王对佛法的胜利喜不自胜，更加陶醉于这项伟大的事业。

最成功的莫过于阿育王当比丘的儿子摩晒陀的锡兰（今斯里兰卡）之行。在公元前 251 年，摩晒陀王子受父王委托，率佛教团到达锡兰，同行的还有他的妹妹僧伽蜜多。他们受到锡兰国王提婆南毗耶、帝沙及大臣们的热烈欢迎。他们仿照阿育王将佛教定为锡兰国教，通令全国遵行佛法，这样，佛法的实施也受到了锡兰人民的拥护。比丘僧团和比丘尼僧团分别建起来了。僧伽蜜多还把从菩提伽耶佛祖得道处的那株菩提树折下的一枝幼苗种在了锡兰

的大寺园里，幼苗成活了，从而更引起了人们的崇奉之情。这棵树至今尚存，被视为国宝。一直到今天，佛教仍是锡兰具有代表性的宗教。

同时，阿育王还派出佛教使团进入锡兰，又进入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并进入中国云南，向北越过高原进入西藏。从此在亚洲传播开去，影响着亚洲的政治和社会生活。

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帝王尊崇宗教都是为了更好地麻痹人民利于统治，然而对于阿育王，我们却不能这样妄下结论。从他的主观意志上说，他是完全皈依佛门并虔诚地运用佛教的精神统治帝国。在征服羯陵伽后，他再也没有动用过军队。从阿育王临死时对佛门所作的最后一次施舍，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帝王对于佛教的诚意。

由于沉溺佛教，阿育王逐渐不理政事，对僧侣的大量布施而浪费国家钱财的行为及运用佛教统治所形成的平淡枯燥的生活，使他逐渐遭到身边大臣的反对，他日益大权旁落。以至到最后他病重的时候，已没有任何权力。他病中曾下令大开国库对僧侣布施，可是已经没有人听从。阿育王不禁长叹，更觉世间宝贵，不过风中蜡炬，愈加感慨不已。当时他的手中只有半只解渴用的庵摩罗果，便叫仆人把这半只果赠与僧众。众僧感动异常，用锅煮之，每人喝下一碗汤，然后把果核供奉起来。从这儿可以看到，阿育王对待佛教的态度是相当真诚的。

阿育王的皈依使佛教不仅在印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对印度的历史起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在世界上也得以广泛流传，从而使之成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阿育王连同他那神奇的转折和坦率的忏悔一起，留芳百世。

## 古希腊诞生三位伟大哲人 ——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

古代希腊、罗马文化，是一切西方文化的源头，而在古代希腊文化中，哲学则是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的排头兵，它是思想的先导。

古代希腊哲学，在人类哲学发展史上占有一席很重要的地位。平民与贵族的斗争，贫者与富者的斗争，奴隶与奴隶主的斗争，奴隶主民主派与寡头派的斗争，城邦之间的争霸斗争，充满了希腊的历史。在这些复杂的斗争中，产生了西方古代史上的“百家争鸣”局面。希腊的哲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发生、发展起来的。希腊也因此产生了无数影响后来的人类思想家。在他们当中，尤以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为最著名。他们对于西方文化的发展起了奠基的作用。

海森堡曾经说过：“一个人没有希腊自然哲学的知识，就很难在现代原子物理学中取得进展。”那么，究竟是谁奠定了希腊哲学的基础，对现代自然科学和哲学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公元前5世纪，重新去认识一下这三位伟大的哲学家：“把哲学从天上拿到地上”的苏格拉底；“人类的导师”柏拉图；“一切有知识的人的老师”亚里斯多德。他们对伦理学、辩证法、认识论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永远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熠熠生辉的明珠。

诗云：巍巍盛德，莫之能名；光风霁月，涵育贞明。

往事已越千年，古老的地中海经历了多少风云变幻、沧海桑田，然而远古三位哲人卓尔不群、独立特出的形象却不会消失；洁白的云朵依旧在慢慢地飘逝，但三位哲人震古烁今的思想却不会离我们而去。

公元前5世纪中期的雅典，街头、广场上熙熙攘攘，人来人往，每一个人都在忙忙碌碌地工作劳作着。突然，大家纷纷驻足听两个人正在进行的一场激烈的争论，其中一位长相十分难看，厚嘴唇，狮子鼻，大肚子，但他却思维敏锐，不时地抓住对方话语中的矛盾，层层批驳，最后竟使对手理屈词穷，低头认输。人们对他那雄辩的口才、高明的见解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时一位旁观者悄声对其同伴说：“那位苏格拉底先生真是天神对我们雅典的恩赐啊！”原来这位其貌不扬的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哲学家苏格拉底。

苏格拉底大约生于公元前470年，出身于平民阶层。他曾继承父亲的职业，做了一位雕刻匠，可是不久他就致力于哲学和社会政治活动。

当时的雅典正值伯利克里执政时期，提洛同盟的金库从提洛岛转移到了雅典城邦，这极大地促进了雅典经济的发展；统治者对各种文化活动又采取宽容和保护的态度。因此，各个学派的学者纷纷来到雅典讲学，这为苏格拉底进行学习，从事研究，提供了很好的便利条件。他曾追随阿开劳斯学习过哲学与天文，拜过智者普罗底柯学习语言学和修辞学。在长期的求学生涯中，苏格拉底开始崭露头角。在他20岁时，他同爱利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巴门尼德及其弟子芝诺展开了一场大辩论。这说明苏格拉底在青年时期就开始形成了一套系统的哲学观念，从而显示了他的卓越才华。为了宣传自己的学说，苏格拉底又经常在各种公众场合与别人辩论，很快就饮誉于全希腊了，并且在他身边逐渐地聚集了一批门徒，包括柏拉图、色诺芬等一批著名思想家，从而成为当时奴隶主贵族思想家的领袖人物。

柏拉图在其《申辩》篇里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苏格拉底的弟子凯勒想

知道他的老师到底有多聪明，就偷偷地问德尔斐神庙传神谕的女先知，女先知告诉他，苏格拉底是人间最聪明的人。

的确，苏格拉底思想之深邃是当时无人能匹敌的。他的主要思想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他所谓的“自己知道自己无知”；

二是他所谓的“美德就是知识”；

三是他的方法，即精神“接生术”。

我们先来讲讲第一个方面。据说苏格拉底获知德尔斐神庙的神谕之后，感到自己并不聪明，因而就去证实这个神谕。他就到处去找有知识的人谈话，包括政治家、诗人、工匠等，结果发现他们都不比他聪明。因此，他又反躬自问，推论到“知己无知”正是他聪明的地方，苏格拉底以此要求每一个人都要“知己无知”。然而，这种说法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我们首先必须指出，苏格拉底认为知识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经由概念的，知识是普遍的，绝对的，永恒的。人不能也不应该去认识客观世界，要研究的是神的智慧和意志，而神的智慧和意志又体现于事物的目的之中，因此人应该去研究事物的目的。可以说，苏格拉底是欧洲哲学史上目的论的创始人。所以，“自己知道自己无知”无非是叫人不要从自然本身获得知识，真正的知就是服从神。

苏格拉底思想的第二个方面是他一生中最关注的伦理学问题。苏格拉底强调探究了神的智慧和意志的事物的目的，同时要人认识“真正的我”。他认为一个人应当关心自己的灵魂，由于只有灵魂或理智才能使人明辨是非，分清“善”与“恶”。因此，苏格拉底把他的伦理学说建立在一种知识论上。据此，他提出“美德就是知识”，即美德就是关于“善”的概念的认识。那么什么是“善”呢？苏格拉底认为善就是对人有用的、有益的，诸如健康、财富、正义、聪敏等等，这些行为是有益还是有害，取决于指导他们的灵魂，因此，善可以说系于智慧。知识又从何而来呢？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和知识不是来自客观自然界，而是先天有的，如果要使人们意识到先天的知识，必须通过引导、启发，也就是教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格拉底称自己为知识的“助产士”。苏格拉底对于知识来源的看法就为以后柏拉图的“回忆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最后谈谈苏格拉底的“精神接生术”。如前所述，苏格拉底自称为知识的“助产士”，他在讨论各种问题时，双方一问一答，通过诘难揭示矛盾，使对方逐渐修正意见，从而导致真理。这种所谓的“接生术”其实是一种归纳法，也就是通过归纳形成普遍概念。这种通过归纳下定义的方法，在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发展史上是有贡献的。

遗憾的是，苏格拉底本人并无学术著作留下来，现在关于苏格拉底的学说，主要依据于色诺芬的回忆录和柏拉图的对话集。此外，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也有零星记载。而且苏格拉底本人的传世之作只有《阿波罗颂》和根据伊索寓言改编的几段小诗。

尽管苏格拉底一生在学术上建树颇丰，颇受尊敬，可是在仕途上郁郁不得志。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他三次出征，尽管作战勇敢，然而却无人赏识。与此同时，雅典民主派力量受到很大摧残，民主政权被推翻，出现了“三十僭主”的统治。公元前399年雅典恢复民主制后，因为苏格拉底的两个弟子是“三十僭主”的成员，苏格拉底自己被控传播邪说、引进新神、毒害青年

和反对民主，因此 500 人法庭判处他死刑。这位伟大的哲学家饮下一杯毒芹水后安静地死去了。

尽管苏格拉底死了，但他的思想却留下来了。

苏格拉底虽然死了，但他的后继者柏拉图将他的目的论、回忆说和概念的辩证法继续加以发挥和系统化，逐渐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被誉为“苏格拉底的唯一的‘继承人’”柏拉图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他在哲学上又作出了什么贡献呢？

下面就来看一看其人其事。

马克思说过：“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柏拉图生活的时代，正值古希腊的奴隶制和意识形态发生巨变的时期，这时候的民主制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爆发加剧了民主制的衰败。这场战火持续了 277 年之久，最后以斯巴达战胜雅典而告终。为什么经济上、文化上落后的斯巴达能够战胜远比它先进的雅典？奴隶主贵族政体与奴隶主民主政体哪个更先进？奴隶主民主政体为什么适应不了历史的发展？这些问题一直困扰着柏拉图的心。公元前 399 年，柏拉图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打击，他最尊敬的老师、雅典智慧的化身苏格拉底被民主政权残酷地杀害了。

古希腊是欧洲哲学的发祥地，也是欧洲科学和文化的摇篮。这里早在公元前 7 世纪就出现了伊奥尼亚的唯物主义、米利者学派、爱斐斯学派，接着公元前 6 世纪又出现了大希腊的唯心主义、毕达哥拉斯派、爱利亚学派，以后又出现了智者派、新唯物主义。这一时期的希腊各个学派纷呈，各种思想杂然陈列，极似中国古代的春秋战国时期，而在名家辈出的时代中能脱颖而出的柏拉图也恰如当时的孔子。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优秀学生 and 亚里斯多德的卓越老师；作为公元前 4 世纪希腊的大思想家、大哲学家、理念论的创始人；作为欧洲最早的学校——阿卡德米的创办者，获此殊荣是当之无愧的。伯内特称赞他是“最伟大的人物”。他的哲学思想一直延续至今，并产生了柏拉图主义，对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奴隶制度的风雨飘摇、历史变迁的错综复杂情形，以及自己敬爱的老师苏格拉底的惨死，都曾引起柏拉图长时期的反省和沉思。正是在反思之中，柏拉图迅速成长为时代的精英人物。他在反思中探究历史、分析现存社会制度的弊病，并提出了一整套的政治学说。这位伟大的思想家在哲学沉思中，少年时代的情景又浮上了脑海。

柏拉图约生于公元前 429 年，比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小 40 岁，原名阿里斯托克勒，柏拉图只是他的绰号，意即宽阔、壮伟之义，后来才逐渐成为他的正式名字，以致人们把他的原名倒淡忘了。柏拉图的父母都是名门望族的后裔，他的母亲是希腊著名的政治改革家梭伦之后，父亲则是公元前 11 世纪希腊国王科德鲁斯之后，叔父克里底亚以及表弟查米德斯便是上文谈及的“三十僭主”的成员。

由于出身贵族和雅典的传统，因此柏拉图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正规教育。而且少年柏拉图风流儒雅，一表人才，才华横溢，他在文学、绘画、音乐等方面都显示了极高的才华，尤其是在文学上造诣颇深。他的著作不仅是哲学名著，而且是文学名著，并且还有一些优美的诗篇传世。

可是柏拉图最终并未成为专业文学家，却在苏格拉底的引导下，他走上

了艰深的哲学之路。据说，在狄奥尼修斯赛会上，柏拉图听到苏格拉底的演讲后，立即将准备参赛的悲剧作品投入火中，接着便忠实地跟随这位伟大导师学习长达八年之久，而且深得苏格拉底哲学之真谛。苏格拉底也极为器重这位才华横溢的弟子。有这样一则传说：柏拉图拜师的头天晚上，苏格拉底梦见一只小天鹅飞到自己膝上，很快就长满了丰满的羽毛，小天鹅一声长唳便展翅飞向了远方。第二天柏拉图拜师时，苏格拉底满怀希望与热情接待了他，并拥抱了他，并将自己的学识倾囊相授。所以，泰勒说，柏拉图是苏格拉底唯一的传人。

柏拉图一生写了大量著作，并几乎全部被保存了下来，而且保存程度也是相当好的。以柏拉图的名义留存下来的著作，有 35 篇对话、13 封信札和一本定义集。其中可以确定为柏拉图遗著的至少有 23 篇对话、10 封信札。这些著作，思想深邃、文笔华美，体现了柏拉图哲学思想、宇宙理论、政治学说和美学观点。在写作手法上，继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的“问答法”，通过讨论揭露对方的矛盾，从具体事例引出一般概念，进而得出柏拉图主张的结论。此外，他还大量运用神话和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么，哲人柏拉图到底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观点和看法呢？下面我们就来谈谈。

柏拉图首先是哲学家，因此哲学思想是其整个思想学说的基石。他在整理、融合前人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以理念为核心的一系列唯心主义哲学观点。

“理念”这个词，它的希腊文原意是“被祝之物”，柏拉图认为“理念”是客观的，是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独立存在的实体，不能等同于观念。由此，柏拉图进一步提出了理念世界。他指出理念是唯一的真实存在，所以理念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那它与幻影世界——我们的感官所接触的世界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柏拉图在吸收了“摹仿说”后，又进而提出了“分有说”。

他认为，理念是原型，具体事物是由摹仿原型而产生的，是理念的“摹本”。而具体事物之所以存在，乃是由于它分有了理念的结果。为了说明他的这一理论观点，柏拉图以床为例，认为床有三种：理念之床、仿理念之床的具体之床、仿具体之床的艺术之床，它们的真实性越来越差。在理念之间，柏拉图又构造了一个理念的等级系统。他说，具体事物的理念是最低级的，数学或科学的理念是较高一级的，艺术和道德的理念则更高一级，而善则是最高一级的理念。

从理念论出发，柏拉图接着又提出了知识论。一方面，理念论是知识论的基础；另一方面，理念论又是通过对知识论的论证而建立的。柏拉图认为，知识是对理念的认识，它是永恒的、真实的，感性知识只能称为意见，由此认识能力可分为四个级别：理性、知性、相信、猜测。那么认识又来自何方呢？柏拉图认为来自“回忆”，所谓教育就是借助个别事物的刺激，通过人们感官的启动、诱导，从而将已经忘却了的理念知识又回忆起来。

理念论是柏拉图庞大思想体系的基石，由此出发，柏拉图构筑了自己的宇宙理论、政治学说和美学观点。

宇宙是怎样形成的呢？关于这个问题，古代，乃至近代、现代、当代都有不少的哲学家们力图给予解释，如阿那克西曼德的宇宙起源说、康德的星云说等等。

柏拉图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见解。他认为，世界是由一个巨匠或造物主（他们是先于世界而存在的）按照柏拉图所谓的理念世界为蓝图，以善的理念为



指导，各种混沌物质被加诸于理念模式之后，就形成了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巨匠塑造的这个世界不仅是尽善尽美的，而且是唯一的。巨匠首先赋予整个世界以活的生命和灵魂，也为每个星体赋予灵魂。对于人，巨匠首先创造个人的理性灵魂，并创造了低级神，再由低级神创造人的非理性灵魂和各种动物。灵魂是不朽的，并且会转世。在巨匠的创造物之中，人是万物之灵和天之骄子，万物皆为人而创造。这种观点不仅是延续发展了苏格拉底的目的论，而且对欧洲中世纪神学也有很大影响。

在政治学说上，柏拉图主张建立一个由哲学王治理的“理想国”。柏拉图认为，正如人的灵魂有理性、意志、情感一样，一个理想的国家也应相应地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统治者阶级，第二等级是武士阶级，第三等级是劳动者阶级。

统治者阶级是指极少数受过哲学训练的人，他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是神用金子造的，拥有灵魂中的理性部分，它们是理性的化身，以拥有“智慧”为美德。武士阶级是指专门从事战争的军人，是统治者阶级的保卫者和辅助者，是神用银子造的，拥有灵魂中的意志部分，以拥有“勇敢”为美德。至于劳动者阶级是指农夫、手工业者和商人，是被统治阶级，由神用钢铁造的，拥有灵魂中的情感部分，以“节制”为美德。这三种美德相互融合、各司其职时，就会产生第四种美德“正义”。假如这三个等级互相干扰、替代，就会给国家带来最大的损害。

柏拉图不仅对阶级和等级进行了理论描述，而且又为人类设置了一个“理想”的共产式生活模式。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还主张在第一、二等级中实行“共产”制度，共妻共子，取消家庭，由统治者决定婚配，进行严格的教育和训练。柏拉图认为这样就可以保证第一、二等级的本质的纯洁性。这其中的关键在于由哲学家充当国王，他认为只有以哲学为统治工具，才能实现对武士和劳动者的统治。由此不难看出，柏拉图的所谓“理想国”实际上是一种乌托邦，是“哲学王”统治的政府加上斯巴达式的贵族制度。在理想国中，维系整个社会秩序的是意念，而不是法律。在柏拉图后期的政治学说中，他开始认识到法律在社会中的作用。在《政治篇》中，他指出有法民主制优越于无法民主制；在《法律》篇中，他更加强调了法律的作用，甚至在某种地位上取代了哲学。

美学思想也是柏拉图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柏拉图的美学观点同其哲学思想一样，也是建立在理念论的基础上。在《会饮》、《大希庇阿斯》、《高尔吉亚》、《费德罗》等著作中，柏拉图比较系统地阐明了他的美学观点。他认为：美的事物只是美的理念的摹本，它不能独立存在，是易变的、虚幻的。因此人们要认识美，只能从认识一个具体事物的美入手，进而认识美的理念，所以这种认识同样是一个“回忆”的过程。

在文艺和现实世界关系上，柏拉图认为文艺是理念世界的二重摹本，毫无真实性可言；在文艺创作的源泉问题上，他认为文艺创作靠的是天才与智慧，而这种天才与智慧又来自神的恩赐。所以这种反理性主义后来为基督教神学所利用，对西方美学发展起了深远而复杂的影响。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无论是晚期希腊和罗马的哲学还是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实在论，都与之有历史渊源，这点将在后面论及。

柏拉图年轻的时候就曾经非常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可是由于他的家庭出

身和苏格拉底的惨遭杀害，使他从小就鄙视民主制，伯罗奔尼撒战争后，他更坚定了反对民主制的信念。

苏格拉底死后，他的弟子们为免遭迫害，纷纷逃离雅典。公元前 388 年，柏拉图来到叙拉古，见到了叙拉古僭主狄奥厄修一世及其女婿第翁，因为狄奥厄修一世刚愎自用、狂妄自大，柏拉图险些被他杀死。

柏拉图返回雅典以后，开始从事教学活动，在雅典城外创办了欧洲第一所学校——阿卡德米（即学园）。在学园中，学生们学习哲学及各种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伦理方面的课程，采用“苏格拉底式对话”的教学方法。学园创办得极为成功，培养出许多杰出的学生，其中包括亚里斯多德。就在学园兴旺发达时，柏拉图于公元前 367 年第二次前往叙拉古，于公元前 361 年第三次前往叙拉古，柏拉图原认为能把狄奥厄修二世培养为“哲学王”，然而狄奥厄修二世也是个不堪教化的小人，因此柏拉图两次险遭不测。公元前 360 年柏拉图回到希腊后，一直致力于学术工作，直至公元前 347 年殁于他的寓所。

柏拉图出身雅典贵族，因此他关于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阐述也就不可避免地陷入唯心主义泥沼，从而彻底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而且他的灵魂转世、获得知识的途径只能靠回忆说等，这实际上堵塞了人们获取知识的道路。由唯心主义进到了蒙昧主义。

柏拉图的一生，是学者的一生，他致力于学术研究长达 60 年之久。我们纵观他的一生，有两件事将永远彪炳史册，一是创立学园，二是弘扬理性。

柏拉图创设的学园可以说是欧洲最早的学校，这为晚期希腊和罗马的文化发展培养了大批杰出人才。它不仅直接影响了欧洲中世纪的“经院”，而且间接影响了欧洲近代的学院和大学。

作为哲学家，柏拉图对后世也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 K·R·波普尔所说：“西方的思想，或者是柏拉图的，或者是反柏拉图的，在任何时候都不是非柏拉图的。”晚期希腊和罗马时期的各唯心主义哲学派别，尤其是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15 世纪中叶佛罗伦萨的柏拉图学园，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经院哲学的实在论，以及文艺复兴运动和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中的哲学家们，都毫无例外地受到了柏拉图的巨大影响。所以，从一定意义上说，柏拉图就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伟大奠基者之一和杰出的代表人物。

把柏拉图的学术思想继承下来，并对之加以发扬光大的历史性人物，就是西方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位奠基人——亚里斯多德，他是对柏拉图主义作出系统解释从而被视为柏拉图的真正继承人。

公元前 367 年的一个早上，波光粼粼、阳光灿烂的地中海平滑如镜、水波不兴。这时，在爱琴海北部的斯它吉拉城的港口上，正停泊着一艘整帆待发的海船，船上有一个个子瘦高的风流英俊的青年，他正双目凝视岸上的两个人挥手作别。然后毅然地背转身，拼命忍住因伤感于告别故土亲人就要夺眶而出的泪水，他走进了船舱。

当船开动后，这个年青人又走上甲板，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稍微带有一种腥味的海风，他的胸脯因激动而在微微起伏，嘴里也在喃喃地说着什么，他不时地抬头望一望远方的天空，又不时地平视着一望无际的海面，有时又低头沉思，徘徊于甲板上。

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此时他年仅 17 岁。此时，他就是乘坐一艘去雅典的船只，准备去那向往已久的地方，

去追随那慕名已久的哲人柏拉图，去领会他那深奥而有趣的理论。

亚里斯多德，生于公元前 384 年，出身于马其顿王一个宫廷医生之家，从小受家庭教育的影响，对知识有一种天生的强烈渴求，这也使他最后成为一位欧洲历史知识十分渊博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他也是希腊古典时代的最后的哲学集大成者。他在青年时代曾到雅典跟随柏拉图学习，以后又曾一度被聘为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的教师，后来又回到雅典讲过学。亚里斯多德对于哲学、逻辑、历史、政治、数学、物理、生物、医学等众多领域都有精深的研究，在许多方面都曾提出了自己卓越的见解。

话又说回来，亚里斯多德初入柏拉图的学园学习不久，就立即以其十分敏锐的思维、清晰明辩的头脑、雄辩的口才博得了导师柏拉图的极力赞赏与喜爱。在与伊苏格拉底领导的学校进行激烈大辩论的过程中，亚里斯多德显示了其非凡的辩才，因而为柏拉图领导的学园争得了空前的荣誉，从而成为人才济济的学园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星”，柏拉图则称他为自己学园中的“努斯”（即核心、精神之义）。

亚里斯多德在雅典学习长达 20 年之久，20 年的朝夕相处使得柏拉图与亚里斯多德师生之间，结下了历史上堪称后世典范的深厚的友谊。柏拉图死后，亚里斯多德挥笔写下了一首饱含真挚情感的哀婉动人的挽诗来纪念自己的恩师，以表达自己的衷心敬仰和爱戴之情。在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除了父母的影响外，老师的影响可谓大矣，尤其是对于自己一生的思想、行为都会产生巨大的导向作用。因此对老师的敬仰之意与感激之情是可想而知的，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那颗早已随历史而去的亚里斯多德的爱师之心。

但是，亚里斯多德并没有盲从自己的老师，当他发现自己的观点与柏拉图的观点相左时，会毫不客气地向柏拉图提出来。亚里斯多德曾经说过：“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千百年来，这句名言一直成为一切勇于探索，不为权威所止，敢于追求真理的人们的精神动力。亚里斯多德最为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他敢于向自己的老师挑战，不因敬仰爱戴导师而放弃对真理的追求。柏拉图也喜欢这个固执己见的学生，也没有因同自己意见相左而进行压制与打击，并因此而亲切地戏称亚里斯多德为“小马驹”。这也正是作为导师的柏拉图的最可贵之处。

在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著作中，从第十三章开始，他就完全站在柏拉图论敌的立场上了。亚里斯多德批判柏拉图将理念与具体事物分离开来，批判了柏拉图验证理念存在的方法和联结二重世界的方式，并最终否定了理念论和理念数论。然而可惜的是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弟子们都没有能够认真地对待这种批评。但是亚里斯多德这种不为贤者讳，不为师长讳的认真治学态度，确实值得每一位科学工作者认真学习。

任何一门学科都是在批判与反批判中成长起来的，亚里斯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理念论的过程，在对真理的孜孜探究中，结出了累累硕果，逐渐形成了自己一整套的理论体系。

亚里斯多德的主要著作都完成于吕克昂执教时期。在吕克昂，亚里斯多德创立了逍遥学派，他每天早晨与学生们在林荫道边散步边讨论深奥的问题，下午或晚上则讲授修辞学、政治学等内容。亚里斯多德毕生都保持布衣身份，专心致志于笔耕生涯，他向书本、向历史求知，更向大自然求知，正如他自己所说过的：“求知是人的本性”。亚里斯多德尽管只活了 62 岁，可是根据希西溪的《亚里斯多德书目》统计，亚里斯多德的著述多达 197 种，

光是流传下来保存至今的巨著就有 47 种之多，几乎涉及了人类当时所有的认识领域。下面我们就从整体上来谈谈亚里斯多德对人类文化，特别是对欧洲传统文化的贡献。

亚里斯多德对人类文化的头一个贡献就是把知识系统化，这个思想原来发轫于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进而提出了两个光辉设想：

第一，他认为各类科学之间有内在联系，并且画出了人类第一张科学分类表：科学可分为理论科学、实践科学和创制科学。理论科学可分为第一哲学（神学）、物理学、数学；实践科学可分为伦理学、家政学、政治学；创制科学可分为诗学和修辞学、辩证法。至于逻辑学，不过是哲学的工具，不是所要研究的对象。

第二，亚里斯多德提出每门科学自身应成为一个公理体系。亚里斯多德认为，知识必须既能说明它为什么这样，而且又要说明它必然是这样。一门科学是由一系列证明组成的，证明就是科学的三段论，它以一种知识为根据而推出别的信息。作为根据的信息就是公理，从公理出发，人们按三段论的格式推出一系列定理，从而构成一门科学。虽然亚里斯多德自己的著作中极少甚至没有这样的系统，可是它所具有的独特性和认知模式是有其存在价值的，它并非一连串独断结论的总和，而是在寻求真理过程中的一种尝试。

亚里斯多德一生中花费精力最大的是物理学。他的物理学乃是以往希腊自然哲学的集大成，范围之广，题材之多都是前人所望尘莫及的。亚里斯多德在《物理学》中研究了自然界运动、变化发展的总规律；在《论天》中他研究了宇宙构成论；在《动物四篇》、《动物志》、《论产生和消灭》等著作中详尽地研究了动植物；在《论灵魂》中研究了人的心理现象。他相继提出了运动论、四因论、灵魂论等观点。

亚里斯多德并不认为物理学是最高的学问。由于物理学只说明了自然运动，并没有说明非自然运动；只说明了四因中的质料、形式、动力，并未说明目的。为了明白万物运动的最初原因，亚里斯多德从物理学进入“物理学之后”，也就是形而上学。

亚里斯多德的形而上学首先提出了 14 个问题，作为研究的主要对象，并对这些问题作了正反两方面的说明。这些问题以后成为欧洲形而上学的中心，在西方哲学史上占统治地位达 2000 年之久。

神学是亚里斯多德形而上学的重要内容。它要研究的是永恒的、不运动的本体，亚里斯多德在肯定这种本体存在后，找出这个永恒本体必定包含动因于本身，其本质不能是潜能。那么，这种不动的动者是什么呢？它如何运动其他事物呢？亚里斯多德指出，这种动者实际上是事物所要达到的目的。它作为爱的对象而运动它们。尽管它自身不动，可是由于别的事物要达到它，所以就产生了运动。

亚里斯多德进一步提出，我们必定也有一个认识最高现实性的东西，这就是“理性”。这样的理性就是善，就是神。

亚里斯多德建立的这个百科全书式的思想体系，不但以科学的方法阐明了各个学科的基本框架，创立了科学分类表，而且还使他荣膺“哲学家之王”的称号。

亚里斯多德因为同马其顿家族关系密切，所以在两次反马其顿的怒潮中均被驱逐出希腊，最后在优卑亚半岛的卡尔基斯城郁郁不得志而病死。

可是亚里斯多德的成就并未就此磨灭。在哲学上，他奠定了经验主义的

基本原则。提出了公理化体系的设想，他的逻辑学在 2000 年中一直是欧洲哲学统一性的基础；在自然科学方面，他的生物学体系为林奈的动植物分类学和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奠定了基础，他的“地球中心说”被托勒密所发展，成为教会统治人们的精神工具。虽然亚里斯多德在自然科学上犯过不少错误，然而他探索自然的方法和角度，他所提出的问题至今仍有其存在的价值。

在中世纪，特别是托马斯·阿奎那之后，亚里斯多德的权威性和基督教会的权威性一样不容置疑。近代和现代的科学和哲学也是从肯定或否定亚里斯多德开始的。回顾人类思维的历程，谁也不会否认也难以否认亚里斯多德是西方文化的一大奠基人。

古希腊文明到现在为止已有 2000 多年了，然而历史的风风雨雨并不能淹没灿烂辉煌的古希腊文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三位伟大的哲人以其改变并确定人类新思路的功绩而将永远彪炳史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立志于探索自然和社会奥秘的勇士。

## 斯巴达克大起义

公元前1世纪，风和日丽的亚平宁半岛上空一派安静和平的景象。然而，地下的岩浆在涌动，古代欧洲最大的一次奴隶大起义不久将如汹涌的岩浆，喷射而出，这就是斯巴达克起义。

“宁为自由而战死，决不为富人的娱乐而丧身！”起义奴隶的不屈吼声惊动了地中海，震撼了全世界。他们用自己的血肉之躯，谱写出人类追求自由的又一不朽篇章。

罗马共和制时期，穷奢极欲的奴隶主阶级对奴隶恣意蹂躏，广大奴隶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受尽折磨。

当时的罗马奴隶充盈，奴隶制经济盛极一时，从贵族的深宫宅邸到手工作坊、农场庄园，都大规模地役使奴隶劳动。奴隶们戴着锁链，生产出供奴隶主消费的谷物、葡萄、橄榄及工艺品、服装等，罗马经济显赫一时。

然而，罗马共和国繁荣的背后，却浸透了奴隶们斑斑的血泪。他们被看作“会说话的工具”，可以标价在市场上公开出售或像财产一样转让、赠送。他们大多戴着镣铐，打着赤脚，住在阴暗潮湿的板房地窖里，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奴隶主贵族们从战争中掠夺的战俘奴隶处境尤为可怜，一场战争结束后，少说也有几万奴隶被投入奴隶市场。奴隶主可以任意打骂、处罚，甚至处死奴隶。

处境最凄惨的要算角斗士了。丧心病狂的奴隶主阶级从埃特鲁里亚贵族葬仪上的角斗士的殉葬中获得启发，他们开办了角斗士学校，专门培养角斗士，让他们到角斗场上自相残杀，直至一方战死。伴随战死奴隶的最后一声呻吟的是贵族们野兽般的狂呼乱叫。

非人的虐待、痛苦的折磨终于激起奴隶的反抗。公元前188年，拉丁地区的奴隶秘密筹划起义，不幸事泄，500多奴隶被处死。公元前185年，阿普里亚地区7000牧奴大起义。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04年，西西里岛的奴隶两次揭竿而起，并一度建立了自己的短暂政权“新叙利亚王国”。与此同时，意大利半岛的努塞利亚、西努耶萨、明图伦、小亚细亚的帕加马也都曾爆发奴隶起义。公元前104年，卡普亚郊区3000角斗奴也曾发动过起义。

然而，这些起义都迅速被扑灭了。奴隶们的悲惨处境没有丝毫改善。他们挣扎着、呻吟着在社会的最底层，乞盼着自由的早日降临。斯巴达克起义就是一次奴隶求解放的斗争。

在讲述这次规模宏大的奴隶起义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来介绍一下起义的主要领导人斯巴达克。

斯巴达克是希腊东北色雷斯人。色雷斯人文化虽然落后，但多骁勇善战，坚毅顽强，所以被称为“蛮族”。

但斯巴达克可不是一般的色雷斯人，他高大英俊，“勇悍异常，膂力过人”，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和希腊人一样富有智慧和仁慈。”

当时，罗马共和国的广阔疆域内，被奴役的异邦人不断奋起反抗。斯巴达克也参加了色雷斯人反抗罗马统治的斗争。起义很快失败了，按照惯例，战败的俘虏大多被收为奴隶，斯巴达克也难逃厄运，他被辗转卖到意大利。因为他相貌出众且力大无比，被角斗士学校的校长连杜鲁斯·巴提阿特斯一眼看中，于是，斯巴达克被买到卡普亚，成为一名角斗士。

卡普亚角斗士学校是专门为各城市竞技场提供角斗士的主要场所，这里

的角斗士基本上是由所谓的“罪犯”和战俘奴隶组成的，其中有大批像斯巴达克一样的外籍人，如色雷斯人、高卢人、里克利亚人和克尔特人等。

在角斗士学校里，奴隶角斗士们被训练在竞技场中杀死野兽或角斗士对手的本领，然后，他们就被送到竞技场上。

角斗场上的规定是，如果一方身着盔甲，另一方就须持投枪；如果一方用大方盾和短剑，对手就用小盾牌和长剑。其中一方在格斗中击倒对方以后，将由观众来裁决失败者的命运。在这种情况下，十有八九的奴隶战败者都在观众的示意下，死在自己同胞的手里。

角斗士们痛恨那些作威作福的奴隶主们，他们感到自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供人观赏的困兽，不是自己去刺死别人，就是别人来刺死自己。朝不保夕的生活，使角斗士们萌生了逃走的念头。

最先提出来的，就是色雷斯人斯巴达克。那是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疲乏的角斗士们躺在自己的破席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睡，今天校长巴提阿特斯的训话还在他们的耳畔回响：“你们要抓紧时间加强训练，再过两个月，你们就要奔赴罗马竞技场一展雄姿了。养兵千日，用在一时，而且，我提醒你们记住，这可是决定你们自身命运前途的关键时刻，生死在此一举！”

“杀死情同手足的兄弟？还是死在情同手足的兄弟刀下？”二者都同样痛苦。

黑暗中传来一个角斗士的悠长的叹息，大家都心照不宣；这是一个痛苦而残忍的世界。

“兄弟们！有件事要和大家商量。”黑暗中传来斯巴达克那深沉浑厚的声音。角斗士们都竖起了耳朵，斯巴达克的睿智、幽默、勇敢坚毅早已使他无形中成为他们中的有影响力的人物，只是不知今晚他又要说些什么。

“我知道你们大家和我一样，也在为两个月后角斗场上的厮杀发愁。我们当然不是怕死，男子汉大丈夫，顶天立地，死有何惧？只是，我们不能这样去死，刀剑应该是为我们的敌人，那些达官贵人、贵族、太太们准备的，杀死自己的兄弟是我们的耻辱。”

一些曾在角斗场上杀死过别的角斗士的奴隶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眼前立刻浮现出在贵族们的欢呼声中，垂死的同伴绝望无告的眼神，心中一阵抽搐疼痛，往事不堪回首，而自己不也总有这样一天吗？

“你说我们现在怎么办？”有人轻声问道。

“宁为自由而战死，决不为富人的娱乐而丧身！我考虑过了，我们可以砸烂身上的镣铐，冲出牢房，逃回故乡！”

屋内空气顿时仿佛凝滞起来，角斗士们的心在澎澎直跳。这可是一件不能不慎重考虑的大事，如果失败了就会被处死。

“早晚总得死，何况这样总有一线生的希望！我听你的”一个角斗士率先打破了寂静。

“我跟你走！”

“我也听你的！”

“我们选斯巴达克做首领吧！”

角斗士们激动地聚拢在斯巴达克的周围，商议起出逃的计划来。

这是公元前73年夏天的事。

就在斯巴达克与200个角斗士准备出逃的前一天，一个角斗士泄露了风声。被巴提阿特斯提走审讯。情势万分危急。斯巴达克不愧有大将风范，他

当机立断，率领几个角斗士用厨房的刀和叉为武器，一拥而出分头劈开一扇扇沉重的大门，砍死守卫的士兵，顿时，屋内的角斗士们如奔涌的潮水涌了出来，一直逃到维苏威火山上。

卡普亚角斗士逃亡的消息报告到罗马元老院时，因为元老院正面临着内外危机，而且，奴隶不堪忍受凄苦生活而逃亡的事也屡见不鲜，所以，元老院并未立即采取措施，派兵前去镇压。

斯巴达克利用这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组织奴隶们做好战斗准备。首先，“鸟无头不飞”，他召集奴隶们，商议由大家推举起义的首领。结果，他本人众望所归，被推举为总首领，克列克斯和恩迈诺被大家推举为副将。其次，制订出严明的军纪，规定平均分配战利品，任何人不得私藏金银，一旦查出，立即处死。同时，他们又袭击附近的奴隶主庄园，缴获大批武器、马匹和给养，以备战时之需。随着起义军声势的壮大，前来投奔的奴隶很快就达到万人之多。声威大振，使奴隶主闻风丧胆。

罗马元老院终于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公元前72年春，行政长官克劳狄乌斯奉命率3000名士兵包围了起义军的营地——维苏威火山。

形势严峻，如何突围？斯巴达克召集部将商议对策，仍没有好的办法。当时起义军身居悬崖峭壁之上，硬冲下去必定伤亡惨重。

斯巴达克焦灼的目光落在了崖壁上密密缠结着的野葡萄藤上，顿时眼前一亮，“有办法了！”这位一向以沉着镇静著称的统帅此刻也难抑心中的欢喜。

“大家快看，用葡萄藤编成绳索，然后，如此如此……”斯巴达克对凑过来的两位副将耳语一番，听得他们连连点头，连声说“好办法！好办法！就这么办！”

于是，他们召集士兵，很快编成了几十条又长又结实的藤梯，然后从悬崖上放下去，大家有秩序地结队攀援而下。罗马军队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们围得水泄不通，料定插翅难逃的起义军会从百丈悬崖（他们唯一疏忽的地方）突围出来，而且如神兵天降般地在他们的背后出现。顿时阵脚大乱，起义军斗志昂扬，一举击溃了敌军。

起义军在与罗马军队的初次交锋中，大获全胜。斯巴达克卓越的军事才华与超人的胆识开始表现出来。

维苏威火山的奴隶呐喊，振奋了挣扎于苦难深渊中的奴隶的心，求自由谋解放的号角吹出了他们心中的斗争之花，“投奔斯巴达克”成为许多贫贱奴隶的共同心愿。

在短短的两个月时间内，起义军迅速壮大。斯巴达克认真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和力量对比，立即决定对军队进行整编。他根据罗马军队的编制，将自己的士兵整编成主力兵、后备兵、骑兵、投枪兵等。同时加强军事训练，部队战斗力大大提高。

维苏威一战，克劳狄乌斯统率的罗马军队溃不成军，使元老院很是恼火，决定增兵围剿斯巴达克军。

话说起义军从维苏威突围出来以后，很快占领了坎帕尼亚，并从坎帕尼亚出发，直指亚德里亚海地区。

公元前72年秋，元老院派出罗马军团统帅普布利乌斯·瓦里尼乌斯统率的1.2万人前去阻截起义军。

交战初期，斯巴达克采用了正确的战略战术，他挑选出两队精兵，采取



分进合围，各个击破的战术，击败了瓦里尼乌斯的副将傅利尔斯和科辛纽斯罗统率的部队。

瓦里尼乌斯见形势于己不利，急忙调整战略，将起义军压缩到一个荒无人烟的狭长地带，现在起义军即使不饿死，也难逃出瓦里尼乌斯在四周构筑的坚固沟堑。瓦里尼乌斯得意地盘算着，露着狰狞的微笑。

起义军再次遭遇到曾在维苏威经历过的四面围困的处境。斯巴达克，这位伟大的奴隶统帅，运用他那色雷斯、希腊人般的睿智的大脑，再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这天晚上，山上一切似乎都与平常一样，从山下向上望去，只见斯巴达克军安营扎寨的山坡上，篝火通明，哨兵们与往常一样在放哨。瓦里尼乌斯放心地安然入睡。

次日清晨，一个士兵慌慌张张地进来禀报，“统帅，大事不好了！奴隶叛军逃走了，我们中计了！”

瓦里尼乌斯听罢大惊失色，急忙来到帐外，只见山上篝火的余烬仍在发出红光，高高竖起的木杆上，绑着一具具罗马士兵的尸体——这就是自己昨夜看到的“巡逻士兵”，哪里还有斯巴达克士兵的踪影。原来斯巴达克军队早已在昨夜神不知鬼不觉地从山路突围出去了。

瓦里尼乌斯气恼地拍了一下头，咬牙切齿地骂道：“这个狡猾的斯巴达克，看我怎么收拾你！传我的命令，快追！”

斯巴达克早就料到敌人会有此举，早已在前方设下埋伏，待瓦里尼乌斯的部队一进包围圈，惊天动地的喊杀声从四面响起，罗马军队措手不及惊惶逃窜，慌乱之中，丢盔弃甲，损失惨重，瓦里尼乌斯的卫队与坐骑也被俘获，他自己也险些被俘。

这一战更加壮大了斯巴达克军的声威，部队壮大到7万人，起义军驰骋于意大利南部的坎佩尼亚、卢卡尼亚、阿普里亚的广阔土地上，使敌人闻风丧胆。

罗马元老院不得不对这位奴隶首领刮目相看了，后来史学家普鲁塔克说：“现在，斯巴达克是伟大的而又威严可怕的。罗马元老院忧虑的已不仅仅是奴隶暴动的不体面的耻辱，它惧怕斯巴达克了，并且意识到处境的危险”。

斯巴达克统率大军一举歼灭瓦里尼乌斯的部队以后，罗马宫廷立即派出两名执政官盖里乌斯和林图鲁斯前来镇压。

这时，斯巴达克大军已越过亚平宁山脉，驻军于阿普里亚，在强敌压境的危急时刻，起义军领导者之间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无法统一。

斯巴达克主张北上，翻过阿尔卑斯山，返回色雷斯故乡，副将克利克斯则主张留在意大利，继续斗争。

后来的史学界认为，当时起义军的这种内部分歧是由起义军人员的来源决定的。起义军中外籍士兵渴望重回故土，本土的奴隶则渴望在意大利获得自由。

他们认为斯巴达克代表了外籍奴隶的心愿，而克利克斯则反映了本土奴隶的心声。

这种提法是否正确姑且不说，起义军的分裂却已成为事实。克利克斯率领3万人离开了主力部队，回师南下，向罗马城进军，而斯巴达克则下令部队烧掉一切无用的东西，卸掉沉重的装备，轻装奔赴阿尔卑斯山。

起义军的分裂不仅给了敌人以可乘之机，而且也削弱了自己的战斗力。

公元前 72 年冬，克列克斯的部队在阿普里亚的加尔干诺山附近，与罗马执政官盖里乌斯的部队相遇，起义军虽拼死抵抗，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约三分之二的战士英勇献身。起义军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

继克列克斯部的大伤亡之后，斯巴达克军也遭遇到了被围堵的险境。

在前有林图斯围堵，后有盖里乌斯追击的紧急状态下，斯巴达克率领部队穿行于环境狭窄的山路间，采用调虎离山之计，与敌人周旋。部队很快由 9 万人壮大到 12 万人，挥戈北上，直抵白雪皑皑的阿尔卑斯山。然后出其不意地改变原定的翻越阿尔卑斯山计划，一个回马枪又杀回意大利。

两执政官围堵不力，再次败北。罗马元老院决定派出以凶残著称的大奴隶主克拉苏，统率 6 个军团，前去镇压起义军。

克拉苏为了严整军纪，实行残酷的惩罚措施。他把临阵脱难的 500 名士兵分成 10 人一组，每组抽签处死一人，以此振奋军威，企图一举歼灭起义军。

公元前 71 年夏，克拉苏的军队在与斯巴达克军的作战中，连连失利，他的副将统率的部队也败在了斯巴达克军的手下。但是，克拉苏毕竟老奸巨滑，他制订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并扼制了通往罗马的交通咽喉。

斯巴达克起义军被迫转战意大利半岛南端的亚普里亚，准备从海上突围到西西里。

本来，斯巴达克事先已经和海盗头子达成协议，租用他们的船只渡海。然而见利忘义的海盗却被西西里总督维里斯收买，背信弃义，陷起义军于绝境。

因为，滔天的巨浪使木筏无法通过，所以，从海上突围的计划只能落空。

现在，起义军只能掉头北上。然而，克拉苏早已严阵以待，在半岛的最狭窄处，布下了所谓的“克拉苏防线”。这是一道横贯整个地峡的壕沟，深宽各达 4.5 公尺，长 50 公里，并在沟边筑起高大坚固的防护墙，起义军三面环海，一面受敌，只能与敌人决一死战。

公元前 71 年初秋的一天，斯巴达克起义军用木头、树枝、石头、敌人的死尸和死马填平了壕沟，冲破克拉苏防线，向布隆度辛进军。然而，罗马派出的另一支大军鲁库鲁斯已抢先占领了布隆度辛，为防止陷入敌人联合夹击中，斯巴达克毅然下令回攻克拉苏！

那是一场历史上罕见的大决战。奴隶们以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英勇的斯巴达克身先士卒，大喊一声“兄弟们，冲啊！”千万的奴隶排山倒海般的呼声在他们领袖的身后响起，卡普里亚平原的大地也为之震撼！

刀剑声、嘶杀声响成一片，前一批人倒下了，后一批人又扑了上来。直杀得天昏地暗，怒潮翻滚！

英雄斯巴达克接连杀死了两个百夫长，越战越勇，正在他准备与大奴隶主头子克拉苏决一死战的时候，不幸被敌人的标枪击中了大腿，顿时鲜血如注，他弯下一条腿，举着盾牌，强忍住伤痛，继续与敌人斗争，越来越多的敌人围了上来，斯巴达克英勇牺牲。

这场战役结束后，罗马奴隶主在清理战场时，发现有 6 万战士英勇阵亡，整个卡普里亚大地血流成河！

起义军中有 6000 战士突围之后，又被克拉苏包围。惨无人道的克拉苏下令将所有奴隶钉死在从卡普里亚到罗马城沿途的十字架上。

但是奴隶反抗的怒火并未就此熄灭，起义军的余部坚持斗争 10 年之久，给罗马奴隶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

斯巴达克领导的奴隶起义距今已有 2000 年之久，但这位伟大的奴隶领袖及其领导的这次惊天地、泣鬼神的伟大起义，仍激励着后世的人们为争取自由、解放而勇敢战斗！

马克思称他是“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是“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列宁也称赞他是“两千年前最大一次奴隶起义中的一位最杰出的英雄”。

斯巴达克起义的伟大精神永放光芒！

## 欧几里德和他的《几何原本》

从公元前4世纪末亚历山大帝国分裂为一些大小王国起，到公元前1世纪它们完全被罗马灭亡止，这是希腊人统治近东文明古国的时期。这些王国的文化与古典时代的希腊文化有着继承的关系，当时的各种著作也是用希腊文书写的。不过，这一时期的文化与古老的东方文化传统也是分不开的，其中包含了东方人民的贡献。以前希腊人的文化中心是雅典，而这一时期的文化中心则是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

自然科学在这一时期有明显的发展，这与东方古国天文、数学的长期发展的传统是分不开的。这一时期涌现出了许多杰出的学者，其中就包括了古典几何学的奠基者——欧几里德。

很多数学家建议，应该为把数学点做了最高类型的抽象的发明者竖一座纪念碑，因为这种抽象从一开始就是科学工作的必要条件。然而，欧几里德不需要。他，全凭着他的一本著作《几何原本》而稳居世界最著名的数学家之列，流芳千古。《几何原本》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教科书之一，是数学界的《圣经》，它为建立数学的通天大厦打下了第一块基石，而他的著者——欧几里德，在20世纪以前一直是几何学的同义词。

数学有它自己独特的见解和智慧，超越它对科学的任何可能的应用，任何瞥见了科学对它本身的意义的人，它都慷慨地给予奖励。对数学乃至人类历史有过卓越贡献的欧几里德，他仅仅把自己能为人类做的思想和方法留下来了，然而他自己却似轻鸿一只，踏雪无痕。

到目前为止，人们无法为几何学之父树碑立传，像对其他许多名人那样。从他的相貌到他的脾气，从他的曾祖父到他的玄孙儿，欧几里德虽是名扬天下，然而有关他生平的资料却几乎没有传留下来，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我们连他的出生年、月、日和地点都无从查考，甚至出生在哪个洲都不知道，也就更不要说出生城市的名字了。他生活的年代，只能靠一些记载来推定。普罗克洛斯（公元前412～前485）在公元前450年左右给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第一卷作注，写了一本《几何学发展概要》。《概要》中指出，欧几里德是托勒密一世（前367～前282，托勒密王朝的建立者）时代的人，早年求学于雅典，深谙柏拉图的学说，他的《几何原本》里引用了许多柏拉图学派的人物如欧多克斯、泰特托斯的成果，可能他也是这个学派的成员。

《概要》是研究希腊几何学史的重要原始参考资料之一。另一资料是帕玻斯的《数学汇编》。《汇编》中提到阿波罗尼奥斯长期住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和欧几里德的学生呆在一起，这说明欧几里德在亚历山大教过学。

今天，人们对这位几何学的先驱者的了解也仅限于此。然而关于他如何教导人们治学的历史小故事却较为详细地留传下来了。

《几何发展概要》里记述了这样一则轶事：托勒密王问欧几里德，除了他的《几何原本》之外，有没有其他学习几何的捷径？欧几里德回道：“几何无王者之道。”意思是说，在几何学里，没有专门为国王铺设的平坦的大路。这句话后来推广为：“求知无坦途”，成为传诵至今的箴言。

做学问是无贵贱贫富之分的，是无捷径可走的，欧几里德的认识在今天对我们仍然具有启迪作用。

根据托比亚斯的记载，欧几里德不仅是一位温良敦厚、和蔼可亲的教育家，而且对于愿意献身于科学研究的人，他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地引导他走

进科学的殿堂。可是他十分反对那些在学习上不肯花功夫刻苦钻研、投机取巧的作风。

有一个青年学生，慕名跟欧几里德学几何学，他在刚刚开始学习第一个几何命题的证明时，就问欧几里德，他学习了几何学以后将会得到什么，欧几里德没有直接回答，略作沉思，对他旁边的另一个学生说：“给他三个钱币吧，因为他想在学习中获得实利。”

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欧几里德对于科学是持一种正直、专一的治学态度的，他是极力反对那种不肯刻苦钻研，更反对那种急功近利的狭隘的实用观点的。欧几里德之所以能在几何学上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毫无疑问是与他的为人和治学态度密不可分的。

当我们开始从数学史中理出一条特殊的线索时，我们很快会产生一种沮丧的感觉：数学本身就像一个巨大的墓地，不断地添进新的需要永久纪念的死者。对于这些新来者，如同对 5000 年前为永久纪念而安葬在里面的少数死者一样，必须这样展示，从而使他们似乎仍保持着生前的活力；事实上必须造成这样的错觉：他们的生命从来没有终止。从数学产生那天起，教学家们就一起宣称：数学真理是不朽的，不可磨灭的；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如此，永远如此；它们是形成永恒真理的真正材料，是人类在生、死和衰退的循环往复背后瞥见永恒。数学和其他学科一样，是一点一滴逐步完善起来的。在介绍欧几里德的几何成绩之前，我们不能不先了解一下当时几何学的发展情况。

3700 年前，古希腊的阿赫美斯写了一本文牍员手册，这本手册汇集了计算容器和仓库的容量，土地面积、土木作业的多少等一系列算法，当时人们已经知道了相似形以及比例论。不仅知道了有理数，还发现了无理数，甚至无穷大的概念也有人在使用了，诸如圆周长、圆面积的计算等也已积累了不少算法。那时候，古希腊的哲学和逻辑学思想比较发达，已经有了像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推理法——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的逻辑演绎方法，“在我看来，一个数学家，就他是一个数学家而言，无需专心于哲学——并且，许多哲学家也表示过这种意见。”亨利·勒贝格如是说过，因为哲学与数学是相通的，可以说，到公元前 3 世纪的时候，已经到了一个经验与知识非常丰富，资料成堆的阶段。因此，这时正是希腊文化全面渗透东方世界的一个极盛的时期。

欧几里德深受前面拓荒者的影响，如伊奥尼亚学派、比达哥拉斯学派、柏拉图学派等等。

希腊第一个哲学学派——伊奥尼亚学派的创建者泰勒斯对数学的最大贡献是：开始命题的证明，为建立几何的演绎体系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毕达哥拉斯约生于公元前 6 世纪中期，是萨摩斯岛上的一个贵族派，在当地贵族派失败后，他逃到了意大利南部的克罗顿。他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代表人物。

他认为，万物的始基就是数，由数而有形，有了形然后才有万物。他把抽象的数的概念看作是第一性的，由此也陷入了唯心主义。他的思想中也有某些朴素的辩证法的因素，例如，他认为“一”就同时具有奇数的偶数的性质（“一”加奇数即得偶数，“一”加偶数即得奇数）。这些认识不仅是对哲学发展的贡献，而且也是对数学发展的杰出贡献。

毕达哥拉斯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发现了“毕达哥拉斯定理”。

毕达哥拉斯是因其毕达哥拉斯定理而闻名于世的。据说，在发现了人所共知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之后，毕达哥拉斯兴高采烈，兴奋异常，宰了100头牛来祭掌管文艺、科学的女神缪斯，以酬谢神的默示，故而其定理在中世纪叫“百牛大祭”。这一定理在中国古代亦有证明，称“勾股”定理，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来解释一切，并且将算术和几何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为原本算术的几何也提供了线索。他们的许多成果后来都成为《几何原本》的重要内容。

希波战争以后，雅典实际上就已是人文荟萃的中心。智人学派提出了几何作图的三大问题，希腊人的兴趣并不在于图形的实际作出，而是在尺规的限制下从理论上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是几何学从实际应用向演绎体系靠拢的一大步。以至后来《几何原本》用公理的形式规定下来，从而成为希腊几何的金科玉律。智人学派的安带丰提出的“穷竭法”，经欧几里德的改进，最后成为《几何原本》中主要的证明方法。

原子派学派的德谟克利特用原子法得出一个重要结论：锥体体积是同底等高柱体的三分之一，后来也是《原本》中的重要问题。

柏拉图学派的首创人物是柏拉图。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9年，死于公元前347年，他出身雅典贵族家庭，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他认为世界有两个：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理念世界是永恒的，真实的，完善的，超经验的；现实世界则是无常的，虚幻的，暗淡的，可感知的。现实世界只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微弱而又不完全的反映，而理念世界才是现实世界的本原。这种哲学观点显然是唯心主义的，然而它在数学上却别开生面，对人启迪颇多。

柏拉图学派对欧氏的影响无疑是最大的。柏拉图是继毕达哥拉斯之后对古希腊几何学作出较大贡献的人，他尽管不是专门的几何学家，可是他十分注意几何，传说他在雅典的“科学院”里，公开挂出牌子宣称“不懂几何学的人不许入内！”他的一些主张对于几何原本力图在少数定义和公理的基础上建立演绎体系也是有很大影响的。而且这个学派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欧季克斯，是古希腊仅次于阿基米德的伟大数学家。摆在欧几里德面前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去证明各个命题，而且以逻辑的方法把所有的未证或已证的命题串联在一起，使每一个命题的证明都建立在前题的基础之上。假如要想达到这个目的，就要找出一些本身即真理的所谓公理。在此基础上，用演绎法去整理全部命题。欧季克斯的工作正好是这种设想的具体化，这对于尚处在茫然中的欧几里德来说，无疑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样板，因而成为欧氏黑夜里的一盏明灯。

柏拉图的门徒亚里士多德无疑是形式逻辑的奠基者，他为整个几何大厦的基础构件的选择制定了合理的标准，他给出了“定义”的定义。亚里士多德对公理和公设所作的区别，自然也被欧几里德采纳，他的逻辑思想为日后将几何整理在严密的体系之中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到了公元前300年左右，古希腊几何学已积累了大量的知识，逻辑的理论也日趋成熟，由来已久的公理化思想已大势所趋，此时，形成了一个严整的几何结构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呼之欲出，应期而至了。

有一首诗如是说：他把珍珠串成项链/漂亮的珍珠/用丝线串起来/才能成为灿烂夺目的项链。

欧几里德就正是这样一位把珍珠串成项链的人，他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总结之后，构建了雄伟壮观的几何学理论大厦。

《几何原本》应该说是集体产物。这正如大数学家外尔所说：“如果不知道远溯古希腊各代前辈所建立和发展的概念方法和结果，我们就不可能理解近 50 年来数学的目标，也不可能理解它的成就。”然而，没有创造木石砖瓦的建筑师，利用现有材料来建成大厦也是一项极不平凡的创造。公设的选择，定义的给出，内容的编排，方法的运用以及命题的严格运用，这些都需要有高度的智慧并付出巨大的劳动。正如每日不停劳作的首饰匠，每一件首饰的做成都是一个新的创造。

欧几里德依据自己的构想，在前人浩瀚无涯的理论大海里，精心筛选珠贝，用自己那非凡的逻辑推证能力，使选择出的每一项定理能合理地与另一项定理相吻合，必要时补上失掉的环节和证明。最终，形成了一个独特的体系，后人把该体系的几何学称为欧几里德几何学，简称欧氏几何。

看似简单的工作，然而却包含了无比艰辛的汗水，这也正如欧几里德所说：“求知无坦途。”

在欧几里德之前，已有好几个数学家试图做过几何的结合整理工作，其中有毕达哥拉斯的学生希波克拉底和西底斯等，然而都失败了，或是没有获得理想的结果。而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也就只有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漫长的岁月里，它历尽沧桑却盛誉依旧，表明它有着顽强的生命力。

欧几里德是历史上第一个创造了一种比较完备的数学理论的人，而他的《几何原本》，可以称之为科学著作的数学书。

《几何原本》共有十三卷，它除了平面几何和立体几何之外，还包括了数论、比例论等内容。整个著作以 23 个定义开始，同时列置了 5 条公设和 5 条公理，然后按逻辑次序，系统而有组织地排列命题，并且以严格的方法开展命题证明、《原本》的内容、方法及其公理化体系的结构等，这就在整个数学发展史上起了巨大的作用。这部书里面所采用的逻辑方法基本上有分析法、综合法和归纳法等三类几何证明方法。其中归纳法现在已经成为数学上一个至关重要的推理方法了，而这一方法确实是由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开始的。

《几何原本》被看作一本数学史，这是由于它的所有内容明确地反映了当时的希腊数学状况，同时，它的内容不仅包括了古希腊的几何学，而且几乎包罗了希腊古典时期的数学的全部内容。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誉为数学界的《圣经》，“有幸闯入数学圣地的人们，他们手里持的敲门砖必是《几何原本》”，可见其影响之深广。

《几何原本》中几乎所有的定理和证明方法在欧几里德以前就众所周知了，然而这并不是该书的重要性之所在。欧几里德的卓越贡献就在于他对教材的编排和大纲的编订上。

欧几里德精心挑选的一套定理和公理，用他那严谨的逻辑推理天才，缜密的思路为辅佐，按由浅及深，循序渐进的规律，认真编排。这本书臻于完美，因而刚一问世就取代了所有以前的教科书，使他们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了。以至现在各国的中学教材的几何内容，基本上是《几何原本》的前六卷及后三卷的内容。在《几何原本》问世之后的 2000 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世界许多民族都用自己的语言发行了《几何原本》的翻译本，一直把它作为唯一的几何学标准教科书，《几何原本》是毫无争议的最优秀的教科学。

《几何原本》的伟大意义在于它是用公理法建立起演绎的数学体系的最

早典范。与此同时，在训练人们逻辑思维能力作用上，其影响力大大超过了亚里士多德的任何一篇逻辑论文。它的推理的生动范例，一出现就迷住了众多的思想家。

无论是科学家，还是哲学家、政治家，他们无不为《几何原本》中所显露出来的逻辑辩证所折服。

那位自幼家境贫寒、挚爱读书又很难得到书的前美国总统林肯，当选上议员以后，他已经是日理万机，但《几何原本》却成了他的随身必备品，由于他同时是一个律师，所以他把它作为训练头脑、增强能力、特别是在逻辑语言上的能力的魔书。伟大的物理学家柏斯卡，把《几何原本》当作“制作”的工具，因为一旦打开《几何原本》，使本来敏感得近于脆弱的他就会抛弃一切，陷入“另一个无比精妙”的世界。

《几何原本》在 1482 年印刷出版了第一版，这也是西方最早印刷的教科书。从 1482 年开始，一直到 19 世纪末，《几何原本》的印刷本用各种文字出版了 1000 版以上，而在此之前，它的手抄本也统治了几何学达 1800 多年。纵览世界文化的长河，世界文明的发展已达数千年之久，然而还没有任何一部科学论著，能够象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那样长期、巩固地为广大学子所传诵，它在世上流传之广，影响之大，仅次于基督教的《圣经》，因而它也就被誉为数学界的“圣约”。

《几何原本》的问世，标志着几何学大厦的建立，为数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博得了全世界的盛赞。在 2000 多年间，它被数学家奉为楷模，被哲学家誉为真理，不论哪个主义的学者，几乎都把欧氏几何作为人类理性的典型。几何的定律就是物理世界的真理。我国明代著名科学家徐光启，也对它倍加推崇。他说：“此书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有四不可得：欲脱之不可得，欲驳之不可得，欲减之不可得，欲前后更置之不可得。有三至三能：似至晦，实至明，故能以其明明他物之至晦；似至繁，实至简，故能以其简简他物之至繁；似至难，实至易，故能以其易易他物之至难。易生于简，简生于明，宗其玄妙在明而已。”虽说中国是一个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辈出的文明古国，而且也有《周髀算经》、《九章算术》这类数学精华的贡献，但系统的几何论还是没有形成。中国接触欧氏几何较晚，然而对其热忱和崇拜不亚于西方，这也是欧氏几何影响之大之广的见证。

《几何原本》成了步入科学殿堂的第一个台阶，欧几里德之后的许多数学家、科学家、思想家的成就里都蕴含着欧氏几何所带来的光芒。

例如古希腊大数学家阿基米德现存的最早著作《板的平衡》一书，它就采取了欧氏的《几何原本》的形式，从一些基本的公理（假设）出发，然后，提出杠杆定理的数学推导以及各种形状物体、重心的求法。

牛顿光芒四射的诸多成就也深受欧氏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是非常巨大的，而且也是十分显著的。牛顿在写《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这一巨著时，也用几何形式，也就是用《几何原本》相类似的形式写下来的。许多不同的科学家都竭力仿效欧几里德，他们试图从少数几个原始前提下推导出自己的结论。象罗素和怀特海德这样著名的数学家和斯宾诺莎这样的哲学家都曾做过这样的尝试。

我们能够穷述《圣经》对它虔诚信徒的影响吗？不能。同样，我们也不能穷尽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这部数学“圣经”对无数的科学家、政治家们的影响。



“如果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量的问题，它就充满着生命力；相反如果没有问题了，则就预示着它的发展将衰亡或中止……数学的研究也需要自己的问题……来发现新方法、新观点以达到更为广阔和自由之境界”。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如是说。

《几何原本》不但给人们以科学思维的方法，而且同时，这本书也是促使数学得以创新发展的重要争论之源。经后世人对它进行大量的研究表明，在《几何原本》一书中尚有很多缺陷和问题。其中争议最大的是第一卷中的第五条公理，也就是“欧几里德平行公设”。13世纪英国培根曾在他的书中说，牛津大学的学生，能够细心钻研《几何原本》卷1的第五命题的已属凤毛麟角，所以，第五命题被称为“一群废物”，后来又叫做“笨蛋的难关”。后人为这个公理打了2000多年的笔墨官司，最终引出非欧几何才算完结。

然而是由于对现有知识的探讨和怀疑，才有新的进展，后来平面几何、解析几何、平面解析几何的问世，他们的创设者笛卡尔等人无不承认他们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有割不断的联系，数学的大厦一层一层往上建，越来越壮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欧氏几何的问世，不但总结了以往的数学成就，而且也几何学乃至数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生命力。

《几何原本》传到中国，已是17世纪初的事了。它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

15世纪以前东西方经济交流多系地方产品的小规模交换，而文化交流则往往具有某种贵族的和宗教的性质。国家和民族间的交往与交流，归根到底只是与极少数特权阶层有关的事。可是在新航路开辟以后，欧洲殖民主义者西班牙人、葡萄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等，以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作为后盾，强制地进入美洲大陆和亚非腹地，剥削和奴役那里的土著居民，强制传播欧洲的宗教，推行欧洲的文化，改变那里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18世纪英国产业革命之后，欧洲人把亚洲、非洲和美洲当作殖民地，当作投资场所和商品销售市场，从而引起整个世界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16、17世纪以后，尤其是从18世纪起，随着世界市场的形成，世界上各种文明有逐渐融合的趋势。世界经济逐渐联结成为一个整体，如果还想闭关锁国、自给自足，已经行不通了。因此中国关闭的大门和日本封锁的海岸先后被西方的商品大炮轰开，武器只是执行了商品法官的职能。在新时代，世界各国的交往与交流已经无需用事例来证明，也难以用数字来精确统计了。

从世界各国各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总的趋势来看，如果说中世纪是从东向西流，那么在近代就是从西向东流。因为在中世纪东方比较先进，生产技术和文化水平都高过西方，阿拉伯、印度和中国都高过同时期的欧洲，这就决定了经济文化交流的方向是西向的。到了近代，亚、非、美都变成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变成了西方的殖民地，因而西方的资金和商品源源不断地流向东方世界，靠东方人的血汗和眼泪喂肥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和贵族资产阶级。

这里所说的“西学”，主要是指西方近代的科学文化；所说的“东渐”，主要是指传播到中国和日本。1581年，意大利人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年)在葡萄牙国王的支持下来到中国传教。这个耶稣会教士为了适应中国这个封建文明高度发达的环境，为了广交中国的名士、学者和官僚，他努力学习中国语言，潜心研究中国文献，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和社会风俗人情。同时他还把西方的近代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来。这是西学传入中国之始。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利玛窦曾建议罗马教廷，多

派有学问的教士来中国。因此这个时期来华的传教士，有不少人不仅是宗教家，而且是科学家。1621年来华的邓玉涵，就是欧洲知名的学者，他精通医学、算学和博物学以及多国文字，与伽利略是好友。两人都是研究院的院士。其他如庞迪我、艾儒略、熊三拔、汤若望等人也都是硕学之士。这些西方教士和学者受到中国学者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的尊敬。1583~1644年的62年间，耶稣会教士来华者共19人。他们撰译或与中国学者合作撰译的西学图籍共62种。图籍的数量虽然不多，然而却在中国文化中注入了新鲜血液，有很大的积极作用。

中国学者在摄取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过程中非常注意结合中国的实际。徐光启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只有对西方的中国学融会贯通了，才能赶上和超过人家。除徐光启之外，李文藻、王征等中国学者也是按照这个方针对待西学的。例如，在天文学方面，宋元以前的天文台预告的日蚀不够准确，误差常达一日。元明时误差减至三、四刻。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以后，徐光启就综合中西历算之优点，将误差降到半刻左右。明末清初140年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虽有几次曲折，但总的情况还是好的，受到了官府的支持和人民的欢迎。

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正是这种“西学东渐”的产物。

《几何原本》“此书为益，能令学理者祛其浮气，练其精心，学事者资其定法，发其百思，故举世无一人不当学”。300多年前的徐光启可谓中国的几何先驱了，他所说的这番话可称得上金玉良言。

《几何原本》在中国最早的汉译本是1607年由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出版的。这也是中国近代翻译西方数学书籍的开始。这也打开了中西学术交流的大门，徐光启的译本所根据的底本是德国人克拉维乌斯校订增补的拉丁文书，他和利玛窦的译本只译了前6卷，以后定名为《几何原本》，“几何”这一名称也由此而来。又过了250多年，最后，到了1857年，原9卷才由英国人伟烈亚力和李善兰共同译出。

这里我们再介绍一下徐光启这位人物及其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徐光启生于1562年，死于1633年。字子先，别号玄扈先生，上海县人，明末官僚。他生活的时代，欧洲正进入资本主义时期，天文、地理、数学、机械力学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徐光启吸收了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并和中国传统的科学技术相结合，在天文、数学、生物学和农学方面均获得了新的成就。他组织明朝“历局”工作人员，编制了当时可算很完备的整个天球的恒星图，并采用新的测算法，使日蚀月蚀推测，较前大为精密。他主持编译的《崇祯历书》，是我国天文历算学中一份完整可贵的遗产。他还和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合译了《几何原本》，不仅把欧洲数学介绍到中国来，还为我国近代数学的科学名词，奠定了基础。如几何、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斜方形等，都是由他首先使用并确定下来的。他参加翻译的《测量全义》，介绍了西方三角术和球面三角术，引述了许多新公式。三角函数表也是经徐光启等首次介绍到我国的，当时称为《测圆八线表》。

中国传统数学的明显特点是以算为中心，因此没有形成一个严密的公理化演绎体系，明朝末年《几何原本》的传入，正好弥补了中国算术之不足，然而，实际情况并不理想。明末我国正处在数学发展的低潮。明清两代很少有人对《几何原本》作过专门研究。因为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盲目排外的

政策及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妄自尊大和保守思想的存在，尽管徐光启也曾大力倡导，可惜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此外，徐光启在生物学和农学方面的贡献更大。这方面的研究成果，都汇集到了他的不朽科学杰作《农政全书》中了。《农政全书》共 60 卷，约 60 万字，计分农本、田制、农事、水利、农器、树艺、蚕桑、蚕桑广类、种植、牧养、制造及荒政 12 个部分，举凡农业及与农业有关的政策、制度、措施、工具、作物特性、技术知识等等，应有尽有。《农政全书》不仅总结了 17 世纪以前我国农业生产知识情况，而且还融合了部分外来的农业知识。其中《水利》部分编进了徐光启和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合译的《泰西水利》，介绍了 17 世纪初西方水力学原理和新式提水工具。

无论怎样，科学的火花最终是被燃起来了，清朝末年及后来的詹天佑、茅以升能以出色的才能为自己的祖国铺路、建桥，这也与他们少年时代深受《几何原本》的熏陶与启发有很大关系。徐光启曾预言：“窃意百年之后，必人人习之。”眺望海内外，俯仰古今历史，让每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都会有许多感慨。

由此可见，由西方传过来的欧几里德的千古不朽的数学名著《几何原本》，对中国近现代数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一批数学家、科学家的成长也同样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它虽然在中华大地上几经风雨的洗礼，但最终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芒。

即使到了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这部数学界的奠基之作仍然具有它自身的宝贵价值，它昭示着数学由古至今的漫漫长途的艰难跋涉。

人们会因为太阳有黑子而否认太阳的光芒吗？人们会由于明星不能在人们的眼中永远光亮而忘记掉它曾昭示的黎明的到来吗？不会的。

到现代已有了许多非欧几里德几何学，数学家们终于明白了欧几里德几何并不是可以设计出来的唯一的统一的几何学体系。在过去的 150 年里，出现了诸如黎曼几何等非欧几何。而且本世纪以来，自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被公认以来，科学家们就认识到在客观的宇宙中，欧氏几何并非总是成立的。比如在黑洞和中子星相邻的区域内，重力场非常强，这样欧几里德几何学不能准确的描述出那个世界的模样，由此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它不能把宇宙作为整体来给以正确的描述。然而这些例子极为特殊，欧几里德几何学在大多数情况下都能非常逼真的反映客观现实，欧几里德的权威性仍然是无可争辩的。现代社会科技发展日新月异，随着人类知识的新的进展也许会发现欧氏几何的另一一些局限性，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减少凝聚着欧几里德智慧的成就，也不能削弱他的历史意义。

没有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也就不会有非欧几何与公理化方法的最终确立，更不会有几何乃至整个数学如今的完善。正因为这样，所以欧几里德、阿基米德和阿波罗尼奥斯三人一起被称为：“他们决定了以后近 1000 年的数学进程。”

数学真理是不朽的，不可磨灭的；昨天如此，今天如此，明天如此。永远如此。真理的记载和发现者也是如此，欧几里德和他的《几何原本》千古同辉！66

## 十字军东征

自十一世纪末开始，西欧的封建主和大商人，在罗马教皇的发动下，打着从伊斯兰教徒手中夺回“圣地”的旗号，对地中海东部地区进行了持续近200年的侵略性远征（1096-1290年），这场挂着“圣战”名义的侵略战争，是在西欧中世纪城市和商业贸易发展的历史条件下，西方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产物。西欧城市兴起以后，封建主胃口扩大，企图向外扩充领土，广殖财富。十一世纪西欧普遍流行长子继承制，封建领地由长子继承，其余诸子成为无地的骑士，他们骄奢寄生，身负重债，常在拦截商旅，打家劫舍中混日子，更贪婪于侵占和掠夺新领土。

中世纪这个时代，是一个黑暗、静寂的时代，又是一个在宗教偏执中显得愚昧和狂热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愚昧而狂热的冲动给人类造成的巨大悲剧，更甚于它在思想领域中给人们的深重的压抑。

十字军东征便是这无数悲剧中较突出的一个。这场战争给地中海沿岸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当情绪激昂而头脑简单的人们高呼“拯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而冲锋陷阵时，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不但没有拯救这些所谓的“兄弟”，反而把他们的“兄弟”连同自己一起推入了深渊。

得意的只有“上帝”——那些为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野心而设计出一个历史上巨大的圈套的人。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一世纪中叶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地区。随着它的形成和在罗马帝国境内的广泛传播，它逐渐地分化成两派，即拉丁语地区的西派和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起初，西方教派凭借罗马城为帝国首都的特殊条件不断发展势力，罗马主教逐渐演变为西方教会的首脑。后来，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把首都东迁到拜占庭，更名为君士坦丁堡，东派教会的势力迅速扩张，君士坦丁堡主教逐渐控制了东部教会。随着罗马帝国分裂为东、西两个帝国，东、西两派教会的分化也日益明显。而罗马主教则由于西罗马帝国的国力衰弱和很快覆灭变得地位越来越重要、巩固，直至变成了罗马地区的保护者和实际统治者，虽然直到11世纪格列高里七世才开始垄断“教皇”这一称号，但实际上当6世纪格列高里一世就任罗马主教时，“教皇”的权威就已经形成了。因为这时他既是罗马主教，又是罗马的行政首脑、城防司令和法官。

公元1054年，罗马教皇利奥九世派人到东罗马帝国的继承者拜占庭帝国，宣布开除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基督教籍。拜占庭帝国以牙还牙，亦宣布开除罗马教皇的教籍。至此，基督教东、西两派正式分裂为以君士坦丁堡大主教为首的“正教”（即“东正教”）和以罗马教皇为首的“天主教”。

野心极大的罗马教皇当然不会善罢干休。他不仅时刻梦想打败拜占庭的东正教而一统基督教，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威风，而且还想征服拜占庭帝国周围的伊斯兰教国家，企图充当世界宗教之霸主。

而11世纪的西欧正在进行着一场经济大变革。城市的纷纷兴起和国内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在提高了封建领主消费的同时也留下了其贪婪的欲望永远也得不到满足的缺陷。为了争夺财富，封建统治者内部不断地进行所谓私战，为此，封建领主豢养了一大批以土地作为报酬的骑士以供战争之驱使。但是，当时无主的土地已告罄尽。同时，西欧国家的封建主领地实行长子继承制，因此封建主的大多数儿子变成了“无地”、“无产”和“光蛋骑士”。这样，

“无地骑士”越来越多。他们到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更激化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因此，如何寻求和获得更多的土地和财富及维护其统治是西欧封建主的“无地骑士”等特权阶层内部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当时西欧城市商人，特别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企图独占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从阿拉伯和拜占庭手中夺取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港口和市场，以便掌握贸易优势，因此他们以武器、粮饷，甚至派出船只支持十字军东征。

11世纪西欧的农民，受到的剥削愈益加重。从1089-1095年西欧连续七年干旱，因灾荒之后瘟疫流行，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希望到东方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他们之参加十字军是试图摆脱封建枷锁。

罗马教皇与西欧天主教会作为西欧最大的封建领主，最热衷于对外扩张，他们把无地骑士和贫苦农民的注意力引向东方，借以消除西欧封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教皇从天主教会的立场出发，企图通过东征，把希腊正教会皈依在罗马教皇统治之下，重建统一的基督教世界。还梦想再进一步扩张势力到伊斯兰教世界当中去。

西欧的农民长期处在封建主的残酷压榨下，他们要服徭役，他们要用农产品向封建主缴纳地租、人头税、使用森林或草地费、领主的养兵税、法庭税、桥梁税、市场税和教会的什一税等等。而且，封建主还寻找各种借口敲榨勒索农民。随着11世纪农业和手工业的分离及商业的发展，封建领主的胃口已不满足于农民所供奉的面、肉而又增添了对手工业者提供的武器和意大利商人提供的酒等爱好。为了满足贪婪的需要，封建主进行了连绵不断的割据战争，给本已穷困潦倒、痛苦不堪的农民带来了更大的灾难。当时修道院的文书说战争使有的地方“变成了荒野，差不多有八年之久人烟绝迹”，有的地方“土地荒废，无人耕种。”与此同时，自然灾害也不断袭来，人祸天灾，使得农民不得不寻求一条“生路”。他们有的举行起义，有的背井离乡。

1071年，早已失去昔日东罗马帝国威风的拜占庭与崛起于中亚西亚的塞尔柱克人在曼齐克特摆开了战场。结果拜占庭打输了，只保存了西部的几个沿海城市，国家分裂成很多半自治的封建领地。后来曾有人形容当时从君士坦丁堡皇宫的窗户能望见不再属于帝国版图的东方山脉了。罗马教皇抓住这一时机与拜占庭皇帝谈判，希望“恢复由上帝制定的昔日罗马教会与君士坦丁堡教会之间的一致”，让东正教应受天主教支配。这当然遭到了拜占庭的反对。但是，随着塞尔柱克人和其他异族的不断进攻，拜占庭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拜占庭皇帝亚历克塞一世的女儿说当时“无论海上陆上，处境都非常恶劣，而且严寒的冬季（1090—1091年）封闭了一切出路，因为大雪堆积，连屋门也不能开启”。于是，鉴于帝国危在旦夕，亚历克塞一世向罗马教皇和西欧各国伸出了请求军事援助的手……

拜占庭帝国的求援，正中罗马教皇和西欧各国君主的下怀，也同时符合了封建主、无地骑士、商人和走投无路的农民急切地寻求摆脱困境的共同需要。而拜占庭皇帝的求援信则无疑变成了他们蠢蠢欲动的诱发剂和助推器。信上说：“我们愿屈服于你……君士坦丁堡与其落入土耳其人和彼采纳格人之手，不如落入你手；城内有珍贵的上帝圣物；君士坦丁堡教堂的珍宝足够装饰全世界的教堂。更不必说藏于历代君王及希腊显贵库府中的无数金银财宝了。”这无疑是在告诉西方人这里是天堂，有着享受不完的财富和快乐，你们快来占有它吧。

早在 1071 年拜占庭惨败于塞尔柱克人后，罗马教皇格列高里七世就企图借机吞并东正教。后来，他一再制定侵吞东方的各种计划，念念不忘他东方的“基督教兄弟”。格列高里七世的第二代继任人厄尔班二世教皇继承并发展了格列高里七世的野心，把征服地中海东岸的“基督教兄弟”和“伊斯兰异教徒”视为其转嫁国内危机的重要措施。

有人认为，十字军东征的主要原因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矛盾，是“十字架反对新月”。教皇煽动战争的口号就是“夺回主的陵墓”，“解救圣地耶路撒冷”。其实这全是骗人的鬼话。其实，这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是西方各国统治危机的必然产物，迟早都要发生的。所谓“解救圣地耶路撒冷”只不过是动听的借口而已。我们知道，位于巴勒斯坦境内的耶路撒冷是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所共同尊奉的圣地。基督徒确信其创立人耶稣曾在这里传教、受难、复活、升天；伊斯兰教徒确信其创立人穆罕默德曾乘“天马”从这里飞入天国进入天堂，而且伊斯兰教还曾把这里作为礼拜的朝向。罗马教皇造谣说，信仰伊斯兰教的塞尔柱克人崛起后肆意亵渎基督圣物，迫害到耶路撒冷朝圣的基督徒。其实，这全是骗人的谎言。事实是，塞尔柱克人不仅没有迫害基督徒，而且使基督教信仰者摆脱了拜占庭帝国在宗教和财务上的沉重压迫。塞尔柱克人一直保护着基督徒所确信的所谓“主的陵墓”的那块空地，当然，塞尔柱克人也像拜占庭帝国一样对来自西欧的“朝圣”者收取一定的税额，但这又有什么可非议的呢？

拜占庭的求救给予了他千载难逢的良机。但是，西欧各国的统治者如一盘散沙。他们吵吵嚷嚷，各怀鬼胎，虽然早就对东方的土地和财富垂涎三尺，早就想摆脱艰难的困境，但面对着拜占庭的求援却很难紧密地团结起来共同远征。于是，这个责任历史地落到了一个合适的组织者——罗马教皇的身上，而这也正是罗马教皇盼望已久的。于是，以“拯救东方的基督教兄弟”、“保卫基督教”为口号，西欧各国共同地站到了罗马教皇扯起的大旗下。

教皇乌尔班二世（1081 - 1099 年），原系克吕尼派僧侣。1095 年 11 月，从意大利来到法国的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在克勒芒召开了历史上著名的宗教会议。参加会议的除罗马教皇、14 位大主教、200 多位主教和 400 多位修道院长外，还有众多的封建主、骑士、商人、教士和农民。无数的人挤满了克勒芒城，很多人不得不在城外搭起了帐篷。

在会上，乌尔班向聚集在克勒芒的各个阶层的人们进行宗教狂热煽动，他一边攻击国内的封建暴虐及东方穆斯林的暴行，一边列举法国人的光荣业绩，他要求领主、骑士和农民拿起武器，为解决“主的坟墓”，拯救“圣地”耶路撒冷而战。他把这次战争说成是“十字反对弯月”的圣战，答应为远征参加者“赎罪”，在战斗中死亡的即可升入天堂。他还把东方的物质利益作为诱饵，说什么“耶路撒冷是大地的中心，其肥沃和丰富高于一切土地之上，是另一充满欢娱快乐的天堂”；“遍地流着奶与蜜”；“这边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那边有的是欢乐和丰足。”

这是多么诱人的前景啊！因争夺土地和财富而混战不已的封建主们，无地的光蛋骑士们，幻想垄断地中海贸易权的商人们，被剥削、压迫和穷困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们，以及急于为挽救封建统治危机转移国内矛盾的各国统治者们从这里看到了共同的希望：对，到东方去！到东方去！据说，乌尔班二世演说到这里时，被激动的听众疯狂地打断了。他们连声高呼：“这是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的旨意！”一些人就在会场上把红十字标记缝到了衣服

上以表示参加十字军东征的决心。过后教皇前往都尔、波尔都等地继续进行煽动。

克勒芒会议决定，1096年8月15日为出征的日期，一场由教皇发动的旨在掠夺东方财富统一宗教信仰的侵略战争就这样在“解救圣地”、“夺回圣墓”的幌子下由克勒芒会议最后统一起来和确定下来了……

作为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序幕，应该说是农民十字军的东征，或者准确地说，“东迁”。

克勒芒会议所决定的远征耶路撒冷的消息立刻传遍了西欧大地。早已被穷困、饥饿和痛苦压得喘不过气来的农民立刻就被点燃起满怀的希望和十足的狂热，迫不及待地希望早日迁到流满了蜜和乳的“东方乐土”上。法国一位修道院长描述了他当时目睹到的情景：“非常的热心使穷人十分果敢，以至于谁也不愿所得无几，谁也不管家屋、葡萄园、田地的售价是否相当。人人想尽办法筹集一些现款，出售所有的一切，不是按价值而是照买主的出价出售，为了赶快走上‘主的途径’，不至于落在别人后面。”“大家高价买进一切，而廉价卖出一切……出重价买到路上需要的一切，廉价出售所有以获得出征资料”，他声称，据他亲眼所见，农民用12只绵羊只卖了不及以前一只绵羊的价钱，感叹“人好像被关在一种可怖的牢狱中似的，必须赶快逃出来。”显然，他恰恰就在这感叹声里无意地道出了农民参加十字军东征的真正动因。

1096年春天，急于摆脱困境的法兰西东北部和德意志西部的破产农民约六七万人，组成庞杂的队伍，扶老携幼、沿着莱茵河、多瑙河向东移动。这支没有训练、缺乏装备的队伍，因缺乏粮食，只得沿途求讨。其中一些亡命之徒一路乘机抢掠。这支队伍一路受到袭击，大批死亡。而此时的拜占庭帝国已摆脱了危机而不需要军事援助了。于是连忙将这批人送到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就在这里，这伙农民遭到了塞尔柱克人的围攻，仅10月21日一战就被歼灭2.5万人。结果只剩下3000农民逃回君士坦丁堡。无数的农民就这样无谓地做了教皇的牺牲品。

1096年秋天，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主力部队正式出发。这支部队主要由法、德、意三国的骑士和贵族组成，共约10万人。他们分四路出发，次年春天会合于君士坦丁堡。对于十字军的到来，亚历克塞一世十分震惊和恐惧，但他又想借这支队伍恢复失去的领土，于是他一方面借他人之手袭击这支队伍，另一方面又让十字军的大多数头领们宣誓，但根本没有任何束缚力，十字军仍然是我行我素。他们到处烧、杀、抢、掠。例如，在经过两年多的远征后，十字军于1099年7月15日攻入了圣城耶路撒冷。这群野兽一进入该城，立刻大肆屠杀居民，四处抢掠金银财宝。据《耶路撒冷史》记载，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后，“没有一块地方萨拉森人（即阿拉伯人）可逃避刽子手的屠杀。其中很多人被射死在所罗门庙的屋顶上……又有很多人从屋顶滚下。在这庙里，屠杀了将近万人”。“如果你站在那里的话，你的脚直至大腿上，会染着死人的鲜血。还有什么可说？他们中谁也不能保全性命。妇女与幼童，均不得幸免”。据统计十字军在耶路撒冷共屠杀了7万生灵。而且，这些十字军骑士们还极其残忍，杀完人后他们还不甘心，还要将死者的头摔在石头上撞碎。为了掠夺尽可能多的财富，这伙强盗的原始兽性暴露无遗，据记载：“十字军在大屠杀之后，分头侵入市民家里，抢夺所有财物。他们定下这样的规矩，就是最先侵入人家者，不论这人家是贫是富，就占有、取

得房屋或将邸宅及所有财物据为己有。”他们甚至“把死人剖腹破肠，以取死者生前吞下的金币”，还“拿尸体堆积成山，烧成灰烬，以便容易觅得死者生前吞下的黄金。”圣城人民的累累白骨换来了十字军万贯家产。十字军的首领们更是大发横财。一位修道院长记述说，十字军头领的“金条和金币在库房里堆积如山，像农民茅屋里的萝卜青菜”。十字军在耶路撒冷的兽行戳穿了“援助东方基督教兄弟”、“解救圣城耶路撒冷”的无耻谎言，暴露了十字军东征的真正意图。

占领耶路撒冷后，十字军又不断地四处侵略扩张，在短短几年内就占领了地中海东岸的全部地区。十字军的头领们在教皇的支持下建立起一些国家，其中重要的有北面的爱德萨伯国、里波里伯国、安提阿克公国和南面的耶路撒冷王国四国。这些国家都是按照西欧各国的封建制度建立起来的，十字军的原来一穷二白的光蛋骑士都一跃变成了大大小小的封建主。这些统治者把东方各族人民一律视作农奴，不管是异教徒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还是东方的基督教兄弟。

十字军国家是在罗乌教皇的羽翼下建立起来的。教皇成立了“圣殿骑士团”、“医院骑士团”、“条顿骑士团”等组织派往这些国家，这些所谓“僧侣骑士团”直接受教皇指挥。

十字军之所以能取得一系列的胜利并建立了国家，并不是因为什么上帝的旨意，也不是因为他们战斗力强大，其主要原因乃是东方的伊斯兰国家十分隔离分散，没能很好地团结战斗共同对敌。后来，阿拉伯世界的各国逐步团结起来不断收复失地，这才有了十字军国家的不断呼救和十字军的一次又一次东征……

12世纪后半期，东方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民族英雄——萨拉丁（1138—1193年）。他团结一些伊斯兰国家数次击败十字军国家，建立了以埃及为中心的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阿尤布王朝。萨拉丁领导的反十字军的胜利，震动了整个欧洲。德皇红胡子腓特烈、法王奥格斯都腓力和英王狮心理查联合组成了第三次十字军（1189—1192年），企图重占耶路撒冷。由于德皇在小亚细亚乞里西亚过河时淹死，德国十字军即折回。英法两国国王矛盾重重，明争暗斗，1191年虽然攻占阿克城，但法王旋即返回欧洲，与德皇亨利六世缔结反英同盟。英王无力攻下耶路撒冷，仅与萨拉丁签订了一项条约，萨拉丁允许基督教徒三年内可到耶路撒冷朝圣和经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就大败而归，不得不承认耶路撒冷归属埃及，而只保留一条狭小的滨海地带。教皇和西欧的封建主们当然不会善罢甘休。

此后，他们时刻梦想再次夺取已经失去的东方“天堂”，这才有了十字军的第四次东征（1202~1204年）。

这次东征的准备工作开始于12世纪末，主持人是罗马教皇英诺森三世（1198~1226年在位）。

英诺森三世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家和外交家，才能十分突出。他当选为教皇时才37岁。他不仅把教会有权统治世俗和教皇有权处置国王的教义载入了罗马教会的法律，而且还不遗余力地将之付诸于实践，时刻梦想建立起由他高高在上主宰着的大一统的“世界大国”。

英诺森三世一继位，就立即在给德、英、法、意、匈等国家的通谕中号召同东方穆斯林异教徒进行新的“神圣战争”，命令他们在1199年3月之前作好东征的准备。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例如，为了筹集战争经费，



他命令修道院和教会缴纳财产和收入的回 1/40 的捐税，僧侣和教徒也必须捐款。为了使这一工作顺利完成，他自己主动捐出了个人收入的 1/10。

教皇为这次东征拟定的计划是，在意大利集结部队渡海南下，先直捣阿尤布王朝的心脏——埃及，然后再夺取巴勒斯坦和圣地耶路撒冷，重建耶路撒冷王国。可是，这次东征并没有按照这个计划进行，而是完全抛弃了这一计划，矛头直指“东方的基督教兄弟”国家拜占庭帝国，并在其击溃的废墟上建立起了十字军统治的新的国家“拉丁帝国”（1204~1261年）。造成这种原定计划彻底改变的主要原因有三：

把东正教臣服于天主教为条件而使两派基督教复归于一是历代罗马教皇一贯的政策和梦寐以求的。在英诺森三世统治时期，罗马教廷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炙手可热的英诺森三世自认为不可一世，当然更加试图完成他的前任们未竟的事业。在他继任教皇准备东征而给拜占庭皇帝亚历克塞三世的通谕里，不仅命令拜占庭集结军队以供“圣战”，而且以“父亲”般的口吻宣谕教义，并威胁如果亚历克塞三世拒绝教皇的要求，那么两方就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拜占庭。君士坦丁堡当然不会听从罗马教皇的命令，也不理会它的“正宗”说教，这更激怒了英诺森三世。他密切注视着时态的发展以等待时机。

威尼斯商人的极力怂恿正中教皇下怀。西方国家要远征东方，交通问题解决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威尼斯商人提供船只。但是，威尼斯和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贸易频繁，十分友好，所以不愿因输送远征军而得罪埃及。与此相反，威尼斯商人因为拜占庭的排挤和玩弄阴谋诡计而对拜占庭充满了敌意，所以企图借十字军之手来打击拜占庭。就在威尼斯 1201 年签订的运载十字军条件的协定里，在教皇的默契下，留下了改变十字军侵略地点和计划的“漏洞”和“借口”。

就在罗马教皇和威尼斯商人杀气腾腾的时候，拜占庭帝国内部发生了王位之争。1202 年春，失势的一方以臣服于罗马教廷为条件请求罗马教皇出兵援助，这无疑给坐待已久的罗马教皇送来了“东风”。教皇和威尼斯商人抓住这一时机立刻为出征进行了迅速的准备。

1202 年 10 月，满载着十字军骑士和粮食、武器的 220 余艘战舰从威尼斯出发了。11 月，军队攻占了基督教城市萨拉港，十字军骑士和威尼斯人在这里进行了疯狂的屠杀和抢掠。教皇为“侵犯基督教土地”而表示“无限哀痛”，虚伪地大发雷霆了一番，将威尼斯人开除出教，并劝谕十字军将士为了达到“最高目的”而要“多多忍受”。

1203 年 6 月，十字军攻到君士坦丁堡城下。7 月，占领了城防战略要地金角港。亚历克塞三世仓皇而逃。7 月 18 日，反对派代表重登帝位。然而，十字军骑士并未就此罢休。1204 年 4 月 12 日，十字军攻进君士坦丁堡。13 日，全部占领该城。这伙强盗立刻又干起了他们一贯的烧杀抢掠的罪恶行当。他们闯进宫殿、教堂、修道院、商库和民宅强奸妇女，劫取财物，肆意杀人，整个君士坦丁堡陷入一片恐怖之中。

占领君士坦丁堡后，十字军又继续侵占拜占庭帝国的其他领土。后来，他们在这个“上帝的国度”建立起了受教皇支配的十字军直接统治的“拉丁帝国”（1204-1261 年）。“拉丁帝国”下有三个附庸国家，即：帖撒罗尼加王国、雅典公国和亚该亚（伯罗奔尼撒）公国。每个国家又分为若干封建领土。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由于东方人民反抗十字军的正义斗争，狠狠地

打击了西欧封建主，粉碎了他们的侵略野心。十三世纪初年以后，对东方异教徒进行圣战夺取丰富战利品的号召，也渐渐失去吸引力。各国王权在市民支持下开始强化，再加上西欧各国人民反封建斗争日益高涨，各国统治者与罗马教廷都有后顾之忧。因此，十字军运动走向下坡。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在整个十字军东征历史上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这次东征是十字军东征的真正目的和真正性质的最好说明：它雄辩地证明，所谓“解救圣地耶路撒冷”、“拯救东方基督兄弟”等等动人的口号只不过是教皇和各国统治者手中的遮羞布而已！

在整个十字军东征史上，还有一个所谓“儿童东征军”的闹剧。

第四次东征后，罗马教皇的谎言不攻自破，人们对远征“异教徒”夺回“主的圣墓”的口号已越来越不感兴趣，但罗马教廷却还想死抱着这块招牌以加强它的统治。于是，教会散布谣言说成年人犯有“多重罪孽”，神对成年人的保佑远远少于“无罪”的儿童，只有儿童才能凭借上帝的保佑把圣地耶路撒冷从伊斯兰教徒手中解救出来。于是，在法国，一位12岁的牧童埃提杨疯疯癫癫地出场了。1212年3月，他跑到巴黎的圣日内修道院声称上帝派他为使者作解救圣地的儿童军总指挥，于是在教会别有用心人的支持帮助下，他扛着“上帝显圣”的大旗到处招兵买马，他胡说什么在上帝的旨意下，大海会在他们面前分开，他们可以像《圣经》上的摩西那样如走平地般地在海上行走。这些骗人的谎言当时确实迷惑了不少人。到6月份，在埃提杨的周围就聚得了3万儿童，当然，这其中也不乏成年人，包括农民、教士、强盗和无赖等。

这支无知的然而却是“纯洁”的儿童队伍很快地聚集到南部的马赛港。大海当然不会分开，他们也不可能如走平地般地渡过大海。他们所看见的倒是宣称只想得到“上帝酬报”的船商。阴险狡诈的船商将儿童骗上了船。在运往埃及的途中，两艘船被狂风卷入海底，剩下的5只船到达埃及后，唯利是图的船主立刻将剩下的这些可爱的“基督斗士”全部卖为奴隶。

就在这一年，德国也出现一个自称受上帝派遣收复圣地的“神童”。他也象埃提杨一样宣传受到上帝的帮助可以如履平地般地渡过大海到达耶路撒冷建立“神国”。在他的周围也很快地聚集了2万名儿童。他们历尽千辛万苦到达意大利时只剩下6000余人，但不久就是这些幸存者也溃散了，至此，这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宣告收场。

儿童十字军的出现，既是一小撮别有用心人的有意煽动，又说明了宗教狂热的愚昧和无知。它只能增加历史的笑料而已。

在儿童十字军以后，第五次（1217—1221年）、第六次（1228—1229年）、第七次（1248—1254年）第八次（1270年）十字军的规模都较小，已成强弩之末。罗马教皇虽然野心不死，几次还想再组织新的十字军，均无法实现。1291年，十字军失掉了最后一个据点阿克。至此，由教皇发动的这场为时近200年的侵略战争才以十字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

东方各国人民反十字军的胜利，维护了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使得被摧残的穆斯林文明得到了保存和继续发展。萨拉丁等反侵略的战斗业绩，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